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本期目录

【“九一三”专辑】

口述历史

于运深口述 舒云整理 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

史实考订

蒋健 吴忠带人查获《“571”工程纪要》之说靠谱吗？

阅史漫笔

舒云 林彪事件中的两个谜团

争鸣

陈平泉 林彪事件的关键是林彪是否参与“两谋”

舒云 林彪知道去苏联吗？——与张光渝先生商榷

编读往来

陈闯创谈 55 期

亦文谈揪彭德怀回京的背后原因

【“九一三”专辑】说明

一年一度“九一三”又快到了。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改变了许多中国人命运的历史事件，四十多年过去，相关研究成果与事件的历史地位显然不相称。究其原因，档案不解密自然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九一三”事件毕竟涉及太多的高层内幕。不过，面对这样的条件，民间研究者并不是就只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许多研究者、志愿者多年来一直默默尽着自己的努力，梳理史料，考订史实，抢救记忆，纠正谬误，探讨争鸣……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即使一时不能亲手建成文革博物馆，能为今后的建馆者提供几块砖石也是好的。

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

于运深 口述

舒 云 整理

按：这是原林彪秘书于运深的口述，成文后经于运深审校定稿。

于运深简介：1937 年生于山东蓬莱，1950 年参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助理员，1965 年 1 月任林彪办公室秘书。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办学习班”四年，1975 年终于结束审查，被分配到四川省广安县武装部任参谋，退休后被安置在北京海淀区某军休所。（右图：于运深 1955 年被授少尉军衔时留影。）



整理者简介：舒云，女，安徽省宿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军数十年，曾为林彪、聂荣臻、罗瑞卿、杨勇等将帅作传，1987 年开始研究林彪事件，著有《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6 版；《林彪画传》（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7 版；《百问九一三》（香港）明镜出版社 2011 版；编有《林彪元帅文集》（与李德合编），（香港）凤凰书品 2013 版；《林彪元帅年谱》（与李德合编），凤凰书品 2015 版等。博客：<http://blog.sina.com.cn/sy2222196>

林彪从来没有说过要当国家主席

1970 年早春我随林彪、叶群到了苏州，住在南园。

3 月 8 日，中央下发了《宪法》修改草案的两个版本，一个有设国家主席的内容，另一个则不设国家主席。

当晚，周恩来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杭州，林彪在苏州，都没有到会。林彪由叶群代表他到会。毛泽东的代表汪东兴也专门从杭州赶来，传达毛主席最近指示，并请中央政治局研究几个问题：一是要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二是要修改宪法；三是制定“四五”经济建设计划；四是防止苏修突然袭击，加强战备。汪东兴说：关于在宪法修改中，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说：“我的意见是不设国家主席，《宪法》中也不要国家主席这一条了，我也不担任国家主席”。

毛主席又说：“你们看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要叶群尽快把毛主席的意思传达给林副主席。会后汪东兴邀请叶群、林立果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白薯。汪东兴再次肯定毛主席要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主席再次明确他不当国家主席，并让汪东兴转告林彪，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会上多数人赞同毛主席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也有人仍然希望毛主席重新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专门委托叶群将有关战备、《宪法》起草、国民经济以及四届人大的安排等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林彪明确表示：“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当国家副主席。”

4月11日23时30分，林彪让我打电话给正在长沙的毛主席的秘书，转达他的三条建议：“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我将林彪的这个谈话记录下来，在传给毛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同时，也传给了中央政治局，同时也传给了北京的林彪办公室。这三个地方都会有记录（后来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4号第5页中就收入了我的这个电话记录）。

林彪从来没有说过要当国家主席。据我所知，不仅我没有听林彪说过，我们林彪办公室的其他人也没有听林彪说过要当国家主席。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关于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三条意见。会上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没有异议。江青在会上表示：“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陈伯达说：“没有林彪要当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吧？”以后陈伯达说，有人以为他是拥护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其实他从来没有提过林彪当国家主席¹。

江青提出将讨论结果报告毛主席。会后周恩来给毛主席的信中，提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还提到政治局同意林彪关于新《宪法》中增设国家主席一节，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

汪东兴后来说，林彪让秘书打电话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²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毛主席机要秘书高碧岑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是我接的。高碧岑说他已向毛

¹ 引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第373页。

² 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21页。

主席转报，主席听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来当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当了。你不当，我不当，那就让董老来当吧！再找两个年轻人当副主席，纪登奎和汪东兴。”

我把毛主席机要秘书高碧岑的电话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报告叶群。本来如此机密、讨好的事情，叶群一向是自己报告林彪的，无奈此时林彪正在生叶群的气，不见叶群。

事情是由江青引起的。江青屁大一点事都要找叶群，让军队办，像她照相的器材啦，要海军的军装啦……林彪烦了，不符合规定的就不批。这一不批，就得罪了江青。叶群夹在中间，很不好做人，就在林彪面前替江青说了两句。林彪一生气，说：“我就管打仗，不管别的事！”林彪的气是冲着江青的，但他只能冲着叶群发，说一听女人的声音就头痛，宣布一星期不见叶群。

毛主席机要秘书高碧岑来电话时，林彪规定不见叶群的期限还没到，叶群只能让我把毛主席机要秘书高碧岑的电话报告林彪。（下图：于运深在苏州。）



林彪听了以后，相当重视，让我把电话记录抄两份存档。毛主席办公室那边也肯定有这份毛主席口授的电话记录。

李文普后来也说：他没有听叶群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话。“我们倒是从林彪那里听过他连副主席也不愿当，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秘书于运深写的。我们

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的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当‘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¹

毛主席专程来苏州看望林彪

4月25日上午，毛主席在张春桥、马天水和上海空四军第一政治委员王维国等陪同下，从上海乘专列专程来苏州看望林彪。本来叶群张罗请毛主席到他们

¹ 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住的南园来往，还专门腾出了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但是毛主席没有下专列，而是在专列上接见林彪、叶群。

毛主席当着林彪的面问张春桥：“林彪同志在苏州，你们怎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张春桥说：“他是保密的。”

这是叶群让我看她整理的这次谈话记录时，我看到的。

在毛主席来的头一天晚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并在太空中播放了《东方红》乐曲。毛主席来时，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磁带刚由毛家湾送到苏州，叶群特意放给毛主席听。其实毛主席并不喜好这个，所以叶群也没有讨到毛主席的欢心。

文化大革命初风靡《毛主席语录》，叶群四处搜集各种版本，包括给飞行员用的带皮夹子的《毛泽东选集》。叶群还到处搜集毛主席像章，甚至化装到大街上和路人交换，她兴致勃勃准备搞一百种像章送给毛主席。后来叶群从汪东兴那里打听到“小道消息”，毛主席讨厌这些东西，这才没了热情。

毛主席来看林彪，叶群很高兴。毛主席和林彪在专列上谈话时，我们不在场，只有叶群在场。她作了记录，并整理了一个谈话纪要，在军内一定范围内传达过。我见过叶群整理的毛主席和林彪的谈话记录，所以有点印象。

毛主席问林彪：“周总理年龄大了，对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

林彪没有说话。

毛主席又问：“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还是没有说话。

毛主席再问：“你看小张怎么样？”

林彪说：“还是要用跟您一块上井冈山的红小鬼。”

关于用“红小鬼”的话，我印象深刻。叶群也对我们说过，林彪给毛主席说“还是要靠红小鬼”。叶群还说：“要筹备四届人大了，主席情绪很好。”

就是这次，毛主席邀请林彪出席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答应了。

4月25日下午，叶群口授，让我记录了三条：“叶群向秘书交代：一、送文件、打电话时都要提醒，言不离主席；二、首长（林彪）参加外事活动时，也要提醒；三、你们要注意礼貌，如接送（毛）主席。他们虽然告诉我们不要去，只要一部车到车站。我和首长（林彪）还是要去。不能只想一面。他们叫我和首长（林彪）先走，我们不能走，要等主席的车走了之后，我们才能离开。”

林彪接见新任总政治部干部

1970年4月26日，林彪回到北京。

5月17日下午，林彪在带军委办事组向毛主席汇报前，他先在毛家湾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简要汇报。他们汇报到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曾说：“一个是设，一个是不设，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¹

5月19日17时，林彪在毛家湾接见新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和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以及总政治部二级部长等14名干部，黄永胜、吴法宪在座。合影后林彪说：“把照片洗出来，把每个人的名字都记上。”然后林彪说：“第一次见面，都不认识。只认识李德生同志、黄志勇同志。”林彪逐一询问在座者的名字，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女儿肖力（李讷）。

林彪说：“你们这个年龄正是办事的时候，比较成熟了。你们是个新班子，是新气象，已经看到了新的做法，将来会有新的成就，部队里头会出现更新的面貌。”“我这个人搞军事的，一向分工抓军事工作。但是，我的兴趣是搞政治，搞无产阶级政治。我搞军事是斗争的需要，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对政治有兴趣。”叶群插话：“林彪同志十几岁的时候，就爱读政治理论书籍。”

林彪说：“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你们（指在座的黄永胜、吴法宪）知道，我在东北，首先也是搞政治。……不能离开中心，中心就是太阳，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毛主席就是太阳。有些事不好作主，你们就请示，请示中央军委办事组，李德生同志也在内。……你们不要走不合法路线，要走合法路线，要吸取过去总政治部、报社的经验教训。不抓根本，不走正道，总有一天要垮台。合乎政治原则，合乎组织原则，对革命有利，就不至于垮台。”“我在江苏跟许世友同志说，偏偏要找一个军事干部来总政治部当主任。军事干部中有许多不仅懂军事，也懂政治，他们打过仗，不脱离实际，我偏偏找一个军事干部管政治，找个‘丘八’管秀才。毛主席信任老粗，我也信任老粗。我说这些人粗中有细。”叶群插话：“毛主席很赞成林彪同志这句话。”

林彪告诫他们“有些事不好作主，就请示”，“要走合法路线”，这都是他的原则。在我的印象中，林彪处理中央传阅件的原则是：毛主席画圈我画圈。几乎

¹ 《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第778页。

没有自己的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看不到林彪对中央处理重大问题时的表态与毛主席有任何抵触之处。林彪很谨慎，小事情都要请示毛主席，从不自己做主。林彪一直“步步紧跟”毛主席，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林彪也没有与毛主席“唱反调”。这是因为毛主席并没有反对设国家主席，并说要林彪当国家主席。所以林彪说他不当国家主席，国家主席仍应该由毛主席担任。

就在接见新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他们的同一天，林彪要我们秘书替他准备四届人大的讲话材料。

7月26日，林彪与叶群按惯例到北戴河避暑。我跟着去了。

林彪不知道毛主席圈掉了“三个副词”

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很蹊跷的事情，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张春桥是无意还是有意？恐怕林彪也是担心其中有陷阱。

8月13日下午，康生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继续讨论修改《宪法》草案稿。陈伯达上厕所之际，张春桥和吴法宪就《宪法》草案有关提法发生争吵，吴法宪甚至拍了桌子。张春桥以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¹为据，提议删掉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法宪则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到陈伯达处详谈争吵情况，并报告黄永胜，并与黄永胜分别报告了周恩来和正在北戴河的叶群。叶群作了电话记录。当晚，叶群打电话给陈伯达，请他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²的语录。准备8月14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同张春桥斗。

8月14日下午，林彪得知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吵后，大发脾气，要给毛泽东写信，被叶群好说歹说劝住了。叶群打电话告诉吴法宪，林彪表态：“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即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抓得好。”

本来林彪以为这事没有完，要吴法宪准备好下一次开会继续与张春桥斗争。没想到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张春桥一言不发，顺利通过了《宪法》草案。林彪听吴法宪报告后，说：“那就算了吧，但是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九大”以前，《党章》送审稿第一页有“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毛主席用铅笔圈掉了“三

¹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就已经写上了。

² “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称呼。

个副词”。《党章》送审稿传阅到林彪这里，我看到了，李根清按照“林办”的老规矩，把毛主席的笔体描下来，存档备用。我当时还想，这“三个副词”是林彪用的，毛主席为什么要圈掉这“三个副词”呢？

对毛主席圈掉“三个副词”的事，我们秘书知道，林彪为什么不知道呢？情况是这样的：每天送来的文件电报几百份，光传阅件就一大箩，林彪从来不看，都是由“讲文件”的秘书挑重要的给他讲。“九大”《党章》送审稿上毛主席圈掉“三个副词”，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以前毛主席也多次圈掉过歌颂他的词语，叶群也没有来要过抄件。所以秘书没讲，林彪就不知道。

实际上，周总理这样细心的人也没有注意到“三个副词”曾被毛主席圈掉的事，他是在庐山上看到毛主席发火了以后，才让北京调阅《党章》送审稿的，也就是说他也是事后才看到的。

张春桥在讨论四届人大《宪法》时贬低“三个副词”，激怒了吴法宪。吴法宪报告林彪，又激怒了林彪。如果林彪知道在这以前《党章》送审稿上的“三个副词”早被毛主席圈掉了，或许就不会在庐山上讲那一通话？

8月17日，林彪让我们秘书把1954年《宪法》对资产阶级是怎么提的，现在《宪法》又是怎么提的，翻一翻，看有什么区别。

林彪以为只带了我一个秘书上庐山

早在8月7日，林彪就对我们秘书说：“准备在中央全会上讲话，不在（四届）人大上讲了。”“准备讲三个问题：一、准备战争的必要性。二、大力发展生产。三、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你把我上面讲的这些话告诉主任（叶群），让她去布置。”林彪还说：“我也可能不讲，到那里看情况再定。”

8月8日，林彪对我们秘书说：“争取不讲，少讲。如果是该讲而不讲，是消极的。”

1970年8月20日，我随林彪、叶群上了庐山。

这次上庐山开会，所有的中央委员都是飞机接送。因为九江机场不能落大飞机，我们坐“子爵号”专机到达安庆，换乘小飞机直飞九江。到达九江机场后，我们换乘轿车上了庐山。这一路上，我注意到林彪和平常一样，不说话，面部表情平静。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将在庐山召开。按规定，政治局委员只能带一位秘书，林彪以为只带了我一个秘书。林彪办公室的秘书郭连凯、张云生在毛家湾留守，另一位秘书李春生在叶群的安排下也来到庐山。李春生没有和我们乘同一架飞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庐山。因为林彪不知道李春生也上了庐山，所以李春

生在庐山上必须躲着林彪，成了“黑人”。林彪一向“两耳不闻窗外事”，叶群这套“捉迷藏”很是成功，她能在毛家湾藏住林彪的两个保健医生，在这么大的庐山“藏”个李春生更不在话下。林彪并不知道来了两个秘书，自始至终以为只带了我一个秘书。

庐山会议前林彪犹豫要不要讲话

林彪到达庐山的下午，陈伯达来了，是我接待的。林彪与陈伯达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事后我听叶群说，陈伯达谈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张春桥）发动进攻。

8月21日，叶群在给林彪起草讲话提纲时，对李春生说：“首长一直坚持天才的提法，有人否认天才，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反对首长。在讨论修改《宪法》时，在天才问题上有争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否认天才，否定十一中全会公报，甚至连国家元首的提法也不同意。”叶群这话除李春生知道，我和李文普也都知道¹。

8月22日下午政治局常委会议。后来知道，在谈到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时，五名常委，除毛主席外，四名常委都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主席在会上仍坚持不当国家主席，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²。

以后毛主席又说，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³！毛主席却没有坚持说“不设”。如果毛主席的态度是坚决“不设”，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中的四个常委，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决不会坚持“要设”，更不会试图以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来说服毛主席。正因为毛主席并没有关上“不设”的大门，所以除毛主席外的四名常委都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

会后陈伯达来访，与林彪、叶群密谈。我以后看到，陈伯达是鼓动林彪提出张春桥的问题，说毛主席肯定会支持。林彪没有表态，只说如果要讲，要向主席报告一下⁴。晚上陈伯达又到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彪能在会上讲话。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

¹ 李文普等人 1971 年 10 月 18 日揭发：“罪行选” 46 期；李春生 1973 年 3 月 26 日揭发：原载 1980 年 8 月，总政林彪案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编《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1970 年 3 月至 1971 年 9 月）》。

² 参见《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第一版，386-387 页。

³ 参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1576 页。

⁴ 《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 2011 年 1 月版，第 691 页。

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好干部受不起劳累辛苦，“坏”干部受不起摧残折磨，人民也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还是可以的。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危害实在太太。陈伯达乐观地认为，在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傅崇碧）、贺龙的问题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意见都一致（实际上并不一致）。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主席肯定会支持。

林彪当时没有表态，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开会前向主席报告一下。林彪让叶群和我准备一个他讲话的稿子，搜集北京突出政治有些什么效果，还强调要发展经济，没有提出设国家主席问题。

8月23日上午，叶群对李春生说：“下午全会要开会，首长可能在会上要讲讲话。有可能讲一下宪法问题。”叶群让李春生改一改原来的稿子，准备讲话提纲。李春生把稿子抄清，叶群、林立果立即拿到林彪那里。

就这样，在叶群、陈伯达鼓动下，林彪决定向毛主席汇报，听毛主席的意见。

警卫秘书李文普说：开会前讲不讲那番话，林彪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见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说，要讲！到最后一刻，林彪才决定拿张春桥开刀¹。

林彪的庐山讲话毛主席事先知道

庐山会议一年后，1971年毛主席南巡，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²。

事实不是这样。我当时跟着林彪去了会场，我记得很清楚，本来通知九届二中全会8月23日下午3时召开，代表们都在会场上坐好了，主席台上却一直空着。庐山会议开幕式推迟45分钟。终于毛主席在前，林彪在后，微笑着从休息室出来，走上主席台，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紧随其后。开幕式由毛主席主持，宣布“我们的二中全会现在开会”。周总理讲了会议的安排，宣布三项议程：一、讨论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康生讲了毛主席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指示和修改宪法的过程。最后毛主席宣布林彪讲话（另一种说法，毛主席问常委，你们有什么说的，林彪说我要讲“一点意见”，所以毛主席后来把自己批陈伯达的文章定题为《我的一点意见》）³。

¹ 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² 参见《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10月，555页。

³ 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6页。

会后下来，叶群对我们秘书讲，首长（指林彪）在会议上讲话了，讲得很好，他讲话没有完全按照你们起草的提纲讲，专门讲了一下天才问题，没有点名，讲得很策略。叶群还对秘书李春生说，首长在开会前和主席谈话，她在走廊散步，防止 11 楼（江青）闯进去¹。

据我所知，林彪讲话的内容，毛主席事先知道，这一点不止叶群说过，林彪也说过。陈伯达说：“会散后，我问林彪，你的讲话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毛主席知道。”²

叶群让我复制林彪讲话的录音，林彪讲话录音是从中央办公厅借的，我带回北京，从总参二部借来录音机，复制时我注意听过。林彪在大会讲话时，没有点张春桥的名。林彪讲话全篇除了吹捧毛主席，就是不指名地批判张春桥，毛主席在会场从头听到尾，并没有当场插话反对，而且会后还同意全会各组再听一遍林彪的讲话录音。

8 月 23 日晚上，周总理主持政治局开会，吴法宪提出对林彪讲话要讨论三天，汪东兴提出要重放林彪讲话录音。

8 月 24 日上午 9 时至 10 时，各组开会。10 时 30 听林彪讲话录音。下午，各组开会讨论林彪的讲话。晚上，原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停开，政治局委员分别参加各组讨论会。19 时 10 分，陈伯达给叶群打电话，商量修改林彪的讲话稿。叶群要秘书李春生把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连同陈伯达送来的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稿，整理成书面发言。

林彪虽说上了庐山，但他和毛主席一样，除了参加全会的开幕式、闭幕式和大会外，不参加小组会。林彪听叶群讲她的发言后，说：“你发言的水平有很大提高，看来你近来是学习了不少东西。”

叶群让我迅速抄存一份华北组二号简报

8 月 25 日上午，华北组第二号简报送来了。我先看了一遍，我的感觉是这个简报一边倒，陈伯达、汪东兴在简报上都有拥护林彪讲话的表态。林彪对这份简报极为重视，让我将全文念了两遍。林彪听后哈哈大笑，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

与此同时，看到华北组第二号简报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却非常害怕。江青带张春桥、姚文元去见毛主席，说这样搞哄起来了，要揪人了，华北组要揪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把华北组第二号简报送给毛主席看，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¹ 李春生 1973 年 3 月 26 日揭发，李文普 1972 年 3 月 29 揭发，见总政林彪案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 1980 年 8 月编《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1970 年 3 月至 1971 年 9 月）》。

² 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 374 页。

我事后得知，叶群在电话里对吴法宪说：“汪东兴讲，吓得张（春桥）姚（文元）脸都白了，去毛主席那里闹，毛主席游泳都没游成。”

汪东兴及时把“小道消息”告诉了叶群，却没有说毛主席的态度。谁知道毛主席向着江青、张春桥。8月25日下午，他临时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组长开会，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违背“九大”方针，决定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停开小组会，不要揪人，不然就会分裂。毛主席还召见了林彪、周恩来、叶剑英，吹了一点“风”。

林彪回来后对叶群讲了会议情况。叶群对李春生说：首长在水主席处开会回来了。主席说，烧一烧可以，不要烧焦。要降温了。叶群让李春生不要再整理她的书面发言了，叫李春生把草稿给她，以后可能还要用¹。

中央办公厅通知，根据毛主席指示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叶群让我迅速抄一份留存，然后再上交原件。

林彪用“三心”“三好”安慰叶群

8月26日上午，毛主席宣布休会。各大组都接到了中央办公厅关于26、27日暂停会议的通知。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白天游庐山、晚上看电影和看戏。

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批评了他们，要吴法宪检讨。

当时我们虽然都在庐山上，却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陈伯达犯错误了”。

林彪不爱游山玩水，更不会去看电影。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听我讲文件。林彪说：“军队的老干部都是炮筒子，说话走火。本来是好事，给他们弄糟了。”“这些老干部是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的，国家还得靠这些老干部，那些人能干什么？”我知道他说的“那些人”是指的张春桥等人。

8月26日晚上，毛主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伯达、吴法宪检讨。林彪为陈伯达、吴法宪开脱，毛主席则批评林彪所说的“一句顶一万句”和“四个伟大”。从这一天开始，毛主席不分昼夜找人谈话，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

据我观察，林彪这时还没有特别消沉，但情绪明显比刚上庐山时低多了。毛主席让林彪在住地找几个人谈话。林彪睡不好觉，叶群让我给林彪讲点花絮，逗林彪开心。而叶群这一段情绪非常低落，老是哭，林彪反过来安慰叶群，口授了“三心”（“忠心、热心、细心”）和“三好”（“好学、好问、好帮助人”），让我写在纸条上，交给叶群。

¹ 李春生等1971年10月18日揭发，李文普1972年3月29日揭发，见总政林彪案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1980年8月编《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1970年3月至1971年9月）》。

8月27日上午，中央办公厅通知：各省自行安排座谈，谈三个问题，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学林彪的报告（讲话）思想问题可以谈深一点；不要揪人，要谈遍（即每个人都要表态）。

8月27日下午，叶群对林彪说：“几个组都闹起来了。矛头都是对着你来的。”林彪说：“那是吓唬人的。”吴法宪对林彪说：周总理让他检讨。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叶群也反复在电话里给吴法宪“打气”：你犯错误不要紧，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如果屋里坐不住，可以到外边去玩玩。

林彪压下了三个老干部的信

8月28日上午，中央办公厅通知，综合《宪法》修改意见，可以个别出去参观。下午不要外出。

这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三位老干部给毛主席写信，还要揪人，并提了五条意见。信送到我这里，林彪听我讲后说：“此件压十天。”

叶群知道后，对我说：“今后凡是遇到称赞首长的和要揪人的事，要注意把关。”

这封信再也没有送走。“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三个老干部要揪人的信被从毛家湾抄出，我记得写信的有许世友、杨得志等，他们当然也为这封信吃了苦头。

8月29日20时零5分，陈伯达的缪秘书来电话，是我接的，并留有电话记录稿。内容是：伯达同志处缪秘书电话，1970年8月29日20时5分伯达同志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23时40分，叶群叫我回电话：“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林彪说吴法宪“不是说假话的人”

8月29日上午，毛主席让林彪在住地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林彪说：这次会议是主席要他召开的，做做思想工作，要互相消除误会。与会者说要改造世界观，要好好学习，要搞好团结等。

最后林彪说：“吴法宪没有说假话，他不是说假话的人，他跟我几十年都没

有听到过他说假话。”

8月3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各组自己安排活动。

13时40分，在北京中央军委值班的黄永胜被中央安排让李德生回去换下来上了庐山，黄永胜上山后先被接到毛主席那里。然后才打电话给叶群，听叶群介绍这几天的情况。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先后来了，他们几个人谈了近四个小时。叶群强调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发言中不要涉及林彪、黄永胜和她，也不要互相涉及。最后叶群说：“这场斗争有得有失，大家不要着急。”

毛主席的批示起初没有标题

9月1日早晨，毛主席与黄永胜长谈后，摸清了一些情况。他认为问题不简单，在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上写了批语，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将批语送张春桥，上午又送到我这里，请林彪阅。

我对毛主席这个批示印象深刻。这时毛主席的批示还没有起名字，没有标题。中午，毛主席约周恩来谈话，才在批语的抄件上加了题目《我的一点意见》，并在批语中的“陈伯达”后加了“同志”二字。

在印发全会前，毛主席删去了批语中“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一句。这句话我看到了，林彪也看到了。

而毛主席在与黄永胜谈话时，说“101好，有脾气也是好的，这次（他）是为我好”。显得是在为林彪开脱。毛主席是在套黄永胜的话，还是真为林彪说好话？这在事后看得非常清楚了。

林彪听我讲陈伯达的检讨

10时，周总理、康生来访，与林彪谈话。康生说陈伯达煽风点火，吴法宪说假话。林彪说：“我观察了吴法宪20年，没有发现吴法宪说假话。”

下午，林彪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这次庐山会议要拿下陈伯达。15时，林彪在住处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林彪说：这次会议是主席要他召开的，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林彪首先批评吴法宪，没有核实情况就上报，引起他动了气，就在会上讲了话。接着动员大家批判陈伯达，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就是要把陈伯达的威信搞下去。会议进行半小时，陈伯达来了。林彪要大家批判陈伯达，谁也不发言，最后还是陈伯达自己检讨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

会后林彪对我说：在会上对伯达同志的批评，他自己讲了些自己的缺点错误，

其他同志也讲到他的缺点错误。并要我告诉李作鹏归纳几条，比如自由主义，缺乏组织纪律性，脚踩两只船等，开政治局会议前给他。

17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讨论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揭批陈伯达，会议开到零时。会议中周恩来给林彪写了个条子，要他表扬一下张春桥。林彪没有理睬。

9月2日8时35分，林彪要我把战备问题、经济问题拉几个条子，搞发言提纲。16时30分林彪主持战备会议。

9月3日13时55分，林彪躺在床上，叫我读陈伯达9月2日写给毛主席的信，以及陈伯达8月29日的检讨。我念完后，林彪询问了文件发放范围和去听录音的情况。林彪对我说：“要帮助首长把关，发现有不适当的地方就同首长讲。”还说了陈伯达的检讨，强调要注意请示报告。

9月5日，叶群为林彪主持5日晚上政治局扩大会和6日的闭幕会出谋划策，说首长讲几句话，强调团结，反对分裂；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毛主席著作，“一点意见”。不要出影响团结的话，出形而上学的话，首长地位不同，提口号要慎重，注意科学性和基本理论，科学、严谨、热爱。严格要求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要戒骄戒躁，鼓掌通过拥护主席的“一点意见”，点一下夫子（陈伯达）问题，揭了隐患。收文件事由总理说，不宜早。

叶群还专门交代李春生，搞一个详细点的稿子，准备明天要林彪照着念，不发挥。要帮助首长把关。

汪东兴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有人认为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是毛主席在文革中写的第二张大字报。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打倒了刘少奇，而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第二张大字报的文字更加激烈，“……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提到要“炸平庐山”是有所指的。在庐山会议前空军提出在庐山上修个直升机场。因为上庐山的路不短，中央委员中有不少老弱病残，可以让他们坐直升机上庐山。这件事汪东兴知道。但当毛主席上了庐山，发现房子下边在炸石头，问怎么回事。汪东兴说他不知道，是黄永胜他们办的，请示了林彪。直升机场只有半个球场大，也不是什么秘密工程。而毛主席对林彪的怀疑越来越深，甚至想到“轰炸”庐山。

8月25日下午毛主席突然召开会议。林彪去开会，从住地出发后叶群才知道，立即调车去追林彪。追上了，车还没停稳，叶群就急着下车，不小心一屁股

坐到地上，腿也擦伤了。叶群顾不上伤痛，急急地对林彪说，如果会上有什么情况，除了要保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外，千万要保汪东兴。看来叶群对汪东兴是真心信任的，她感谢汪东兴经常给她报告“小道消息”。

叶群这么做倒不是想搞什么阴谋诡计，只是她不想让林彪犯“错误”。林彪的原则是“紧跟”毛主席，而很多动态性的“情报”叶群不可能从毛主席嘴里往外掏，只能通过汪东兴“曲线”得到。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心腹，叶群想方设法与他拉关系，想探听毛主席的动向，以保证林彪的“紧跟”。像汪东兴胃大出血住院，子女当兵，叶群都跑前跑后，汪东兴也非常感激，甚至还发几句牢骚，说谁都不管他的死活，只有叶主任关心他。庐山会议叶群之所以怂恿林彪“点火”，就是她以为从汪东兴那里取来了“真经”。事实上汪东兴在庐山上走得比陈伯达远多了，而毛主席对汪东兴却没有责骂，让他的检讨过了关，却在叶群的检讨上批“爱听小道消息”。可是为什么不查查叶群“爱听”的“小道消息”从何而来？

我们当秘书的都知道，首长的行踪、谈话和文件，甚至首长的病，都是绝对机密，没有首长发话，秘书没有任何理由向外泄露。而“杨余傅”事件后，汪东兴多次把毛主席的“小道消息”，甚至把毛主席的文件偷偷拿给叶群看，连毛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也公开对叶群和黄吴李邱讲，这些情况我听叶群说话时透露过，也听林立果说过，林彪办公室秘书或多或少也都知道。

我至今想不通，为什么汪东兴敢泄露毛主席这些机密，难道他就不怕毛主席收拾他吗？

林立果也假扮秘书上了庐山

林立果怎么也上了庐山呢？林立果 1967 年 3 月到了空军，先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1969 年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虽然林立果在空军作战部担任领导，却不在作战部上班，也很少到作战部去。1970 年他在空军党办成立了调研小组。这个调研小组的成立，是林彪建议的。

1970 年 3 月，四届人大即将召开，林彪准备在大会上讲话。当时我跟着林彪在苏州，林彪准备让张云生为他在四届人大上的讲话准备条子，我立即打电话给毛家湾，告诉张云生：“首长说，让你和李春生两个秘书和老虎组成一个调查研究小组，这个调研小组由张秘书牵头。研究的题目就是怎样搞好抓革命、促生产。首长强调拉条子前必须搞搞调查研究。要抓紧时间，争取早些搞出一个题目来。”

张云生问：“首长这个指示，主任知道吗？”

我说：“还没有报主任。”

张云生说：“不要报了。我可以和春生一起搞调研，但不要再牵上老虎，他愿意搞什么调研，那是他的事，如果再报主任，那是自找麻烦。如果主任再插手，我怎么应付？如果老虎不听我的，我怎么办？我能领导这只老虎吗？”

我说：“首长叫搞抓革命促生产的调研，总得报主任吧？”

“这个当然可以报，看主任怎么说。”

毛家湾内部人际关系复杂，名义上林彪至高无上，但实际上林彪“大撒手”，林彪的权利都掌握在叶群手里。换句话说，林彪办公室是叶群当家。现在又多了个“老虎”，更难办了。我理解张云生的难处，也理解他想“保持一定距离”的想法。

张云生把林彪的指示打了折扣，他向正在北京的林立果通报了林彪指示，只说林彪让成立调查研究小组，并没有提牵头调研小组。林立果同意各搞各的，并行操作。林立果很快在空军党办成立了调研小组，“九一三”事件后，这个调研小组被中央专案组判定为“小舰队”。

这次庐山开会，林立果以军委办公厅秘书的身份上了庐山，由“东道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安排住房。林立果既不是与会者，也不是会务组的工作人员，他没有权利参加大会和各组的讨论，只在会外活动。所以他在庐山上有点活动，但不多，也有限。

8月27日，林立果跑到林彪住处，当面向我大发了几句议论，意思是全怪“叶老胖”，“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叶群）搞的。她要抢头功，尽是瞎指挥。”随后林立果打电话给在北京毛家湾值班的“林办”秘书张云生，也说了同样一些话。

9月6日，林立果对王维国、陈励耘说：“这次事情坏在几个老总身上。”“主任（叶群）根本没有理解首长（林彪）的意图，开会也讲不清楚。首长很生气，主任只是哭。”“本来首长只是说拉一个满篷风就行了，这次打是打不倒的，结果搞得很被动。”“丘八斗不过秀才，看来这个斗争还长，军队日子难过一些。”

以后，林立果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讲庐山会议时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些话，当时林立果在林彪办公室也说过。只是当时我们都认为是小孩子发几句牢骚，没有当回事。

我没有感觉林彪有什么问题

9月6日上午，九届二中全会的各组开会。11时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会公报。

16时叶群交代我，把简报、文件统统交回，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作抄件存。

17时，林彪主持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陈伯达没有出席。周总理、康生讲了话，毛主席插了话。

晚上，林彪让叶群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看望江青，向江青认错，请江青原谅。江青说：“你们过去听陈伯达的话，不听我的话，上当受骗了吧。犯了错误不要紧，今后听我的话，改正错误就是了。”

叶群让李春生根据录音，整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分别交给本人。当天叶群交代已经很晚了，没有搞完，第二天叶群让李春生把录音带回北京，另复制一套。

9月7日，林彪、叶群坐专机回北戴河，我也跟着他们到了北戴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九江机场送行，他们上了飞机与林彪、叶群合影。

到北戴河后，叶群专门叫我回了一趟北京，复制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讲话的录音带，说首长要听。我从总参二部借来机器，复制了一份。这让我有机会再听一遍林彪的这个讲话，我还是认为林彪这个讲话没有任何问题。

1970年8月底，林彪为叶群写了六个字：“玉不琢，不成器。林彪，书赠叶群，七〇、七”明明是在叶群情绪低落时写的，为什么落款时间要提前一个月？是一时笔误，还是故意？不知道林彪是怎么想的，总之林彪叫人把这六个字刻好送给叶群。

这让我想起林彪卧室床头左侧墙上，曾挂过自书条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9月18日，林彪、叶群由北戴河坐专机回北京，我也跟着回了北京。

9月19日晚上，林彪、叶群召见黄永胜、吴法宪。

从庐山上下来，我明显地感觉到林彪的话更少了，也不再听秘书讲文件。虽然我在庐山上身临其境，也看到了毛主席亲笔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但我以为那完全是批陈伯达，林彪没什么事。因为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而且我在林彪身边，确实没有发现林彪有什么反对毛主席的言行。所以我一直比较乐观，我想，到一定时候林彪要说话的。

往常会议文件都是可以带回去的，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却要求所有的文件都退回中央办公厅，还不准传达。叶群让我抄了一份，我还是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

依然高枕无忧。

毛泽东向林彪推荐林豆豆写的文章

林彪喜欢女儿林豆豆，1962年11月17日，林彪给林豆豆写了一个条幅：“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还有一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有人说这是给叶群题的，而我记得林豆豆把这幅题词挂在自己的卧室里。1964年10月24日，林彪又给林豆豆写了一个条幅：“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个条幅一直挂在林豆豆卧室的外间。至于“九一三”事件后怎么挂到林彪屋里的，我不知道。

林豆豆也希望父亲能多笑一笑。她在父亲面前，总是表现出活泼、善谈，逗林彪开心。林豆豆到《空军报》社后，每次采访回来，都要把外面看到的事情讲给林彪听，林彪很愿意听。林豆豆还常常给林彪带些小礼物，如贝壳、小玩具兵等。林彪生命中最后那几天，林豆豆把山海关买来的玩具兵放在林彪面前，上足弦。林豆豆知道父亲对士兵的喜爱，果然林彪目不转睛地看着玩具兵摸爬滚打，像孩子一样开怀大笑。

林彪是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的人，他教女儿林豆豆怎样写文章，说一万个人有一万种写法，要有自己的风格。林彪认为写文章从始至终贯彻一个要点，立意要惊人，要鲜明，要有警句，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要老和尚帽子平塌了，不要淡水一杯。毛主席在196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上看到林豆豆等人写的《三访九厂》¹，称赞写得很好。因为林豆豆是化名，毛主席问了才知道是林彪女儿，于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特意接见了林豆豆，并向林彪推荐《三访九厂》。而这时林彪却茫然不知，回毛家湾后他问叶群，才知道林豆豆他们写了《三访九厂》，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林彪有些不高兴，埋怨叶群不早说。

林彪对子女关心、放手，而叶群则是控制。林豆豆正直，父女情深，而和叶群则母女感情淡漠。但实际上，叶群对林豆豆还是很关照的。在叶群的安排下，1965年林豆豆到《空军报》当了记者。至于林豆豆在《空军报》的进步，像1965年林豆豆发表了《刘亚楼叔叔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等文章，林彪很高兴，叶群也在我们秘书面前宣扬，说豆豆又发表什么文章了，给别人打电话也到处说。

林彪注重从政治上培养儿子

林彪对儿子和女儿的培养是不同的，有所侧重。林彪对林立果的培养没有像

¹ 《三访九厂》，署名田忠、李红（即林豆豆）、齐夫，首发1968年7月13日《空军报》第2、3版，后被《解放军报》、《人民日报》转载。

对女儿林豆豆那样细腻，而是与林立果平起平坐，称林立果是好朋友。林彪和林立果在一起，没有爽朗的笑声，只有严父教子式的谈话。林彪侧重培养林立果处事、看人、用人这方面，即从政治上培养他。1964年10月16日，林彪给林立果的条幅：“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书赠老虎儿。”明显与给女儿林豆豆的题词不同。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林立果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北京大学红卫兵知道林立果是林彪儿子，要推举他当红卫兵头头。而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李讷也拉住林立果不放，要他参加整理林彪的讲话录音。在这种情况下，叶群赶快把林立果送到上海空四军江腾蛟那里。1967年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安排，林立果也穿上军装到了空军司令部。

林彪让林立果看文件，参加拉条子，为他的讲话准备资料，甚至让他参与起草“九大”报告。林豆豆就从来没有这种政治“待遇”。再加上空军一帮人的吹捧，久而久之，林立果的口气越来越大，直到最后不仅不把叶群放在眼里，连林彪他也认为过时了。

叶群干预儿女婚事闹出不同结果

1968年，是叶群开始四处“找人”（为儿女找对象）的一年。

按说儿女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作为母亲的叶群的做法也可以理解。问题是叶群完全瞒着林彪，利用职权兴师动众漫天撒网，甚至让我们“林办”秘书也外出“找人”，这就离谱了。有人说叶群是以此举让毛主席相信，林彪没有夺权之心，而是忙于为子女找对象。还有人说叶群选美是为伟大领袖选的，至于叶群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并没有说过。

叶群为子女选对象的条件，第一是相貌；第二是身材170至175厘米；第三是文化程度本科以上，要学文的；第四是性格，不能找带棱角的。

这一年，林豆豆24岁了。林豆豆的性格像林彪，谨言慎行，虽说是《空军报》社副主编，副师职，《空军报》社给她不少特殊照顾，却都被她婉言谢绝。在婚姻问题上，林豆豆坚决反对叶群大张旗鼓的“选美”。林豆豆认为，叶群之所以热心，是想把女婿和儿媳控制在手里。林豆豆看上的对象，叶群坚决不同意；而叶群看上的，林豆豆也坚决不干。林豆豆在征得父亲同意后，与空军保卫部的小陈建立了恋爱关系。叶群得知后，大发雷霆，立即把小陈调往新疆，强迫林豆豆与她选的对象见面。而林豆豆坚决不见，母女俩就僵在这里了。

林彪完全不知道叶群在漫天“撒网”，他是看一个，满意一个。从林豆豆嘴里得到实情后，林彪明确表示反对“找人”。李文普说：首长不让叶群给豆豆到

处找人。不要到处乱找。林彪是疼爱小孩子的，他根据林豆豆的意思，让内勤给叶群打电话，传达他找女婿的四条：“第一要拿枪杆子，不要拿笔杆子的；第二按德才体貌的顺序，不要老强调相貌；第三不能兴师动众，也不能太急；第四究竟选谁不选谁，最后要豆豆自己做主，别人不能包办。”

叶群一听林彪这四条，立即跳起来，当着内勤的面大骂。当然叶群只敢在我们秘书面前耍一耍威风，不敢找林彪当面闹。叶群一连两天大骂林豆豆，林豆豆反锁着门，叶群进不去，就拼命踢门，更加剧烈地大骂。无论叶群怎么骂，林豆豆就是不开门，也没有任何动静。最后还是王老太太（王淑媛）破门进去，发现林豆豆已经服了 20 多片安眠药，口吐白沫，昏迷在床上。

叶群再也不敢骂了，赶快叫人把林豆豆送到 301 医院急救。从林豆豆的胃里洗出安眠药，抢救成功了。经过一段时间休养，叶群同意林豆豆出院，但有一个条件，不许到人民大会堂“打扰”林彪，林彪那时长时期住在人民大会堂。林豆豆也不想与叶群硬碰硬，她知道，她就是去了人民大会堂，叶群也会阻止自己见林彪。因为谁见林彪都要经过叶群，秘书和内勤不敢私自让林豆豆见林彪。再说，一旦告诉林彪真相，林彪肯定要找叶群算账，叶群会更加残酷地报复。所以，林豆豆没有去找林彪，她安静在毛家湾休养了几十天。在叶群的劝说下，林豆豆到外地“换换环境”去了。

叶群对我们秘书规定，所有给林彪讲的事情都要事先经过她，如果不经她就向林彪汇报，那就惹了大祸，我们谁也不敢。叶群要求“林办”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准在林彪面前说林豆豆自杀，谁说出去找谁算账，我们自然老老实实闭上了嘴。所以林彪至死也不知道心爱的女儿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这件事。

林立果的婚事叶群也非常热心。1969 年“九大”后，叶群派出“林办”秘书张云生、张益民在内的三组工作人员给林立果“找人”。郭连凯由叶群指挥，掌握总情况。这件事我们“林办”秘书都知道，只瞒着林彪，谁也不敢对林彪说实话。

对待林立果，叶群不敢像对待林豆豆一样，林立果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惹急了，他马上跑到林彪那里告状。邱会作夫人胡敏推荐南京军区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张宁，林立果喜欢，而叶群看不上。叶群不喜欢儿媳比自己高，也不喜欢漂亮过头。叶群老是说，不能“媚”了，不能太高，而张宁恰恰又高又“媚”。

为了得到林彪的支持，林立果向林彪告状。林彪叫来叶群问情况，叶群火了，说林彪是「摘桃派」，林彪也火了，狠狠打了叶群，说要和叶群离婚，吓得叶群跪地求饶。

庐山会议后，林豆豆不想再无休止地选下去了，她同意了广州军区 42 军 124 师师部医院的军医张清林，这是黄永胜夫人项辉方介绍的。1971 年 8 月 7 日晚

上，在毛家湾林彪客厅，由吴法宪、胡敏出面，公开了林豆豆和张清林的恋爱关系。此时叶群也收敛了许多，认可了张清林这个女婿，也认可了张宁这个儿媳。

林彪格外关注毛主席对斯诺的讲话

我因为工作忙，水平低，根本没有看出来庐山出了事。虽然知道陈伯达被审查，但根本没有想到牵涉到林彪。庐山会议后期，看不出林彪有什么变化。但我明显感觉到叶群却有很大的变化。叶群不再趾高气扬，说话的语气也亲切多了。庐山会议时，张云生在毛家湾留守，他对我说：叶群外出，每天都要往毛家湾打电话，这次庐山会议，叶群很久才给毛家湾打了一个电话。说二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是号召加强学习，让党的高级干部多懂点马列，主席还叫她多学点哲学。为抓紧学习，叶群让毛家湾赶快收缩，只留一两个人看马列书的就够了，其余帮助工作的人全回原单位。在外面找人也撤回来，免得分散精力。

1970年9月28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到中南海去见了毛主席。

10月1日10时，林彪陪同毛主席出席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国庆21周年大会，宣读张春桥等人拟就的讲话稿。

这是林彪最后一个国庆节。他与周恩来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斯诺和夫人是1970年9月应邀来北京的，文化大革命中，外国人在中国几乎绝迹，而斯诺居然能来到北京，还能采访毛主席，这是他当年奔走延安撰写《西行漫记》的功劳。斯诺是第一个向国外报道毛泽东的外国记者，他在延安就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毛主席不急着见他，让林彪先见。

这时林彪刚从庐山下来不久。我感觉他对于毛主席要他见斯诺这件事很为难，一推再推。

在延安时斯诺采访过林彪，并在《西行漫记》中对林彪大加夸赞。李文普在回忆里也说过，林彪表示：“斯诺是熟人，在延安见过。这些外国记者问这问那，有些问题也不好回答。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

林彪一直拖着不见，周恩来安排斯诺夫妇先去参观访问。可斯诺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他对周恩来说，他准备回去了。周恩来再次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决定见斯诺。这样，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了斯诺。

《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被印成了中共中央文件，送到毛家湾。这份文件是我给林彪讲的，我认为很重要，在“讲”文件时作为重点。我把毛主席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专门画出来了，摘要讲给林彪听。“四个伟大”虽不是林彪的创造，但“四个伟大”经林彪1967年5月1日题词后风靡全国。因

此这个“讨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会不会是毛主席对林彪的批评。

我们当秘书都知道，林彪对毛主席的批示、讲话、谈话等都非常注意。但这一次不同寻常，我注意到林彪格外注意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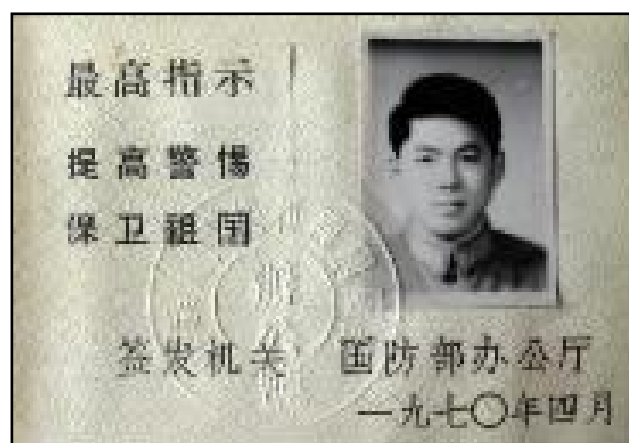
我给林彪讲完《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林彪要我把这份二三十页的文件留下，他要再看看。这在以前我讲文件时是从来没有过的，林彪一般不留文件，而他专门把《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留下来，可见非常重视。

毛主席回答斯诺提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等问题。斯诺问：“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毛主席点点头说：“这些人分三种，第一种人是真的，第二种人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毛主席对斯诺说，所谓“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¹。斯诺说：“毛主席历来是当教员的，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²

叶群不让我们知道她给毛主席写检讨

1970年国庆之夜，林彪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叶群借此机会找毛主席谈话，自认为谈得“很好”，回到毛家湾显得很高兴，好像放下了千斤重担。她决定给毛主席写一个检讨报告。

叶群从庐山会议后回到毛家湾，就像膨胀的毛家湾紧急收缩一样，叶群也“收缩”了很多，像变了一个人，见人就笑容满面。这一段叶群在筹备写检讨，完全瞒着我们秘书和工作人员，可能是军委办公厅的人帮助叶群写的检讨。我是“九一三”事件后很久才看到



叶群的检讨，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更不知道毛主席对叶群检讨的批示。（上图：于运深的工作证内页。）

叶群从庐山上下来后，要求林彪办公室裁减，不仅遣散了临时工，还把老秘

¹ 参见《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经毛泽东审阅），1970年12月18日，王年一编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10月，498页。

² 参见兰州军区政治部印《时事学习参考材料〈斯诺访华的七篇文章〉》16页1971年7月第一版16页。

书郭连凯和李文普、还有我挂职军委办公厅。李文普被任命为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郭连凯任命为办公厅秘书处秘书科副科长，我为办公厅秘书处秘书科秘书。“林办”正式秘书表面上只有三人：张云生、张益民和李春生。张益民经常在外面“找人”，剩下的正式秘书只有两个人。叶群说：以后外边谁问，你们就说“林办”秘书只有两个，最多说三个，这样就把人减了一半。名义上我们三人是军委办公厅的干部，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林办”秘书。

后来又调来一个秘书王焕礼，他担任“林办”支部书记。叶群在庐山上“翻了车”，她的“原则”是：不知道“庐山”内幕的人尽量不让知道。王焕礼是庐山会议后调来的，他没有上庐山，叶群当然要瞒着他了。我是上过庐山的，所以我成了给林彪讲文件的秘书。李根清接了我的班，管理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但是所有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包括叶群的检讨都没有经过李根清的手。

4月15日，叶群、吴法宪的第二次检讨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由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印发。

我看到叶群第二次检讨时，“九一三”事件已经尘埃落地，叶群也早已不在人世。但依我的感觉，叶群的检讨深刻得不能再深刻了，无论如何毛主席不能不满意。但毛主席并没有放过叶群，当然也没有放过林彪。

林彪不听秘书“讲文件”了

到1971年，我在林彪办公室已经七年，是老秘书了。

1970年庐山会议后，本来就深居简出的林彪，更加孤家寡人，情绪低落到谷底。林彪西客厅门外的墙边，摆了一台八音盒，有小型旅行箱那么大。林彪的房间从来不摆杂物，只有这台八音盒是例外。叶群说这是康生从抄家物品中选的。每当林彪散步时，内勤就把八音盒上足弦，能放出十几首歌曲，其中有弹拨古曲，叮叮当当的。林彪散步时内勤就给林彪打开八音盒。但庐山会议后，林彪再也没有听过。听内勤说，林彪偶尔吃的零食也不再吃了。

1970年底，叶群把四个秘书调走了三个，郭连凯、张云生走了，稍后张益民也走了。本来我的工作就很忙，现在四个秘书的工作全压在我一人身上。工作量大得几乎不可想象，我忙得晕头转向，根本没有注意叶群情绪上有什么变化。只是感觉林彪情绪变化非常明显，本来他就不爱说话，此时更加沉默寡言，而且也不听我们秘书讲文件了。他既很少会客，也不愿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什么，甚至多少天没有一句话。偶尔看场电影，也只让李文普从中外的战斗故事片中选些近战镜头，一部影片只选看一两本拷贝。林彪平时除了出去“转车”，就是独自一人在室内踱步，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蜷缩在沙发里。看来他是更加郁闷了。

这一段时间，林彪口述过几张纸条。例如：开朗、愉快、活泼；转移注意力；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偏食，多换样子；多运动……林彪让保密员李根清把这些句子用毛笔抄成三份，分别贴在叶群、林豆豆、林立果卧室的门后。

1971年新年过后，林彪吩咐保密员李根清：“你写句话挂到叶群卧室。‘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李根清找叶群取条幅，叶群说：“不用写了。告诉首长，我知道了。”难怪“九一三”事件后查抄毛家湾，只发现林彪的两张纸条，原来有些条子并没有落实到纸上。看来叶群没有把林彪的安慰当回事。

林彪认为没错坚持不写检讨

1971年2月12日，林彪请病假，与叶群、林立果坐专机到苏州。

2月19日，毛主席对批陈整风作重要批示：“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2月20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报送学习讨论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批示，并批给周恩来、康生，阅后退中央军委。我注意到毛主席这个批示没有提到林彪。

3月7日，林彪、叶群乘专列离开苏州，第二天到达北戴河。

4月3日，林彪、叶群离开北戴河去大连。叶群坐专机当天到达，林彪坐专列第二天到达。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

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飞回北京。

4月20日，周恩来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及毛主席有关批示送林彪阅，并示意林彪到会并讲话。

4月24日，我给林彪报周恩来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情况报告。其中有：“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要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五一节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毛在这段话旁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林彪听我报周恩来的信和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批示，对周恩来提出的希望出席会议并讲几句话，没有表态。以后林彪解释说：“一个人在捣鬼，还是没捣鬼，自己说了不算数，要别人说了才算数。我不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不是有什么顾虑，而是少让别人制造紧张空气和给人以话柄。”

有一次李根清给叶群送文件，叶群正在打电话，说：“林彪同志最近身体不好，情绪也不好，晚上吃两次安眠药还睡不着，……历史上都是站在他一边的，

支持他的，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又整他……”这是叶群的心里话。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被集中在“亚疗”面对面排查时，保密员李根清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李根清去给林彪送文件，听见叶群对林彪说：“你看这文件，方向指向你，你把他（指毛主席）捧那么高，现在回过头来整你，你想到了吗？”林彪一声不吭，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很久，林彪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我要休息了，你走吧，我出汗了。”叶群只好很不情愿地出去了。

1970年庐山会议前，林彪就很少批文件了。批的一些文件都是叶群主动，令李根清模仿的。不管该批不该批，只要叶群愿意批就批，大多数是“同意主席批示”。林彪从庐山上下来，他除了听我讲点中央传阅件外，几乎不听任何其它文件了。那时三天两头文件都报不上去，只能压着，一些重要传阅件在叶群那里也压好多天回不来，大多数文件只能原封不动退回去。

李文普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写过个检讨，这件事我不知道，不知道李文普是怎么知道的。实际上，有一份署名林彪的检讨书是叶群的口授。1971年春天，叶群在毛家湾的院子里边晒太阳，边口授林彪的信，由王焕礼记录。信的大意是：我（林彪）对部队要求不严，脾气不好，今后应该加强对部队的约束，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叶群说是林彪的意思，但到底是不是林彪的意思，并没有得到证实。不过叶群口授的林彪这封检讨信，没有送给毛主席，被压了下来。这也就是说，林彪从来没有写过检讨信。

林彪在4月中旬接见黄吴李邱时明确说：“根据我的看法，你们没错，你们检讨，我不怪你们，也不会生气。但我不会检讨。”

1971年初林彪在苏州哭了

1971年9月13日早晨，周宇驰、于新野劫持的直升机被迫降在北京怀柔渤海所。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副师长胡世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直升机后舱发现一个录音机。当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录音机，不知是什么东西。众人都很好奇，你拍拍我拍拍，录音机响了。

这是林立果偷录的叶群和黄永胜的电话录音。叶群有这样一段话：“……一会儿你上级（林彪）可能会找你。你给我说一两句好话，免得他老欺侮我。所以这个事¹，他没法怪我。”（叶群哭了一会儿）“我现在心里很乱。在苏州，他（林彪）转氨酶高，我们两人都哭了。他（林彪）哭政治上的，我主要是哭政治上的，加上责任上的。……”

这段录音没有时间，但叶群提到在苏州。林彪、叶群是1971年2月到苏州

¹ 指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的，这段录音应该是林彪、叶群在苏州被偷录的，因为林立果此时也在苏州。

这段录音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叶群说“我们两人都哭了。他（林彪）哭政治上的……。”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何况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闯过多少枪林弹雨，从来心不惊肉不跳，而什么样的“政治”能让 64 岁的他流下眼泪？

1971 年五一节晚上林彪的迟到

1971 年林彪只有两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一次是 1971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出席焰火晚会，另一次是 1971 年 6 月 3 日，陪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1971 年 5 月 1 日，我在林彪办公室值班。天安门广场白天没有活动，主要是由各大公园组织欢庆活动，林彪没有参加游园，在毛家湾休息。

当晚天安门广场燃放礼花，因为毛主席要出席，所以通知林彪出席。林彪根本不想去。从庐山上下来后，林彪的情绪一直低落，哪里也不想去，原来仅有的踱步和“转车”也几乎没有了，几乎整天就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不与任何人交谈，也不听讲文件。

五一晚上放焰火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林彪仍迟迟不动。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催问，电话是我接的，周总理说：“林副主席出发没有，叫他快来，主席已经出发了。”

我立即向林彪通报总理请他马上到天安门城楼去，林彪没有表态。以往集会都是林彪比毛主席早到，叶群也是这样要求的，而这次林彪还是没有动。

周总理又打来电话，电话还是我接的。周总理再次请林副主席赶快到天安门城楼来，说“主席已经到了”。我立即向林彪通报总理请他马上到天安门城楼去。叶群也在一边催促：“必须去，总理也打电话催了。”

我注意到林彪的表情非常勉强，愁容满面，明显地很不情愿。但他还是站起来了，在内勤帮助下穿上大衣。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周总理两次打电话催促，林彪可能就真的不去了。因为林彪一向尊重周总理，不愿意驳周总理的面子，这才勉强去天安门城楼应付一下。

专车早就备好了，毛家湾到天安门城楼很近，那时路面上车很少，不存在堵车的问题。但毕竟林彪出发时就晚了。李文普陪着林彪去的天安门，据李文普回来说迟到了。

后来那张唯一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林彪低垂着头，蜷缩在一边，这应该是林彪真实心态的流露。而林彪笑容满面和毛主席走过欢迎人群的那张照片，不是这

个五一节晚上拍的，林彪在这个五一节的晚上迟到了，而且他也是绝对笑不出来的。

1971年五一节晚上林彪的早退

与平时天安门聚会相比，林彪去得晚，回来得早。

照例是李文普跟着林彪上天安门城楼，我没有跟去，我在林彪办公室看电视实况转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会刚开始，林彪就回来了，我们在电视上没有看到林彪的镜头。感觉不一会儿，林彪就回来了。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来来回回连半个小时都不到，首长怎么就转回来了？但想到林彪根本不想去，也就不奇怪了。

当时在现场拍照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回忆说：“……他（林彪）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主席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我们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主席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地，我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时间一点点过去，林彪还没有出现。我开始着急起来，会不会林彪走了？想到这我心里惶惶的，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拍摄还没开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我们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直到这时我还没意识到我那个鬼使神差的‘瞬间’已成为今晚绝无仅有的独家新闻。”¹

我认为摄影师杜修贤的讲述是基本真实的。当时现场不止一个人，十几人甚至几十人。而且最有力的证据是，如果当时有更好的照片，决不会用杜修贤这张暴露毛主席、林彪不和的照片。以下几个材料也可以印证，1971年5月1日的晚会林彪的早退。

《周恩来年谱》：“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不辞而别”²。

《毛泽东传》也有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主席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主席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³

时任林彪警卫队中队长的萧奇明说：“5月1日，……林彪只在天安门城楼

¹ 杜修贤《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转引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62-65页。

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版，455页。

³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1591页。

上站了一会儿，就给毛主席请假，说‘身体不舒服’，马上就回家了。”¹

邱会作说：“5月1日夜，毛主席、林彪在黄永胜陪同之下同时登上了天安门。放了一轮烟火之后，林彪指着自己的头向毛主席说：‘我头疼，早点退场。’毛主席回答说：‘好，今天没有什么题目了。’”

5月初，周宇驰对王飞说：中央汇报会上，吴法宪检讨的时候，怕得要命，林副主席保他。主席一宽大，这几天又像没事了。其实越检讨，捆得越紧，越被动。这个问题只有林副主席看透了，林副主席很生气，所以五一节（晚）上天安门，只呆几分钟就走了，弄得像都没有照下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²。

关于 1971 年五一的照片和纪录片

197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报道配了两张照片，右上方这张是杜修贤拍的，画面上依次是毛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董必武、林彪在天安门焰火晚会上围坐一桌的照片，照片说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上一起观看焰火。新华社记者摄。”照片画面上毛主席和林彪面对面坐着，林彪低着头，像是在打瞌睡，而毛主席侧着脸与旁边的西哈努克说着什么。这是杜修贤拍摄的当晚唯一有林彪画面的照片，整个画面气氛怪异。这样的照片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完全应属于废片，怎么能公开刊登出来呢？

《人民日报》头版右侧中部的第二张照片说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华社记者摄。”这张照片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1971年五一纪录片镜头一致，毛主席、林彪、周恩来三人从手持语录本欢迎的军人队伍中穿过，毛主席穿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林彪穿着军大衣，确实与杜修贤拍的那张照片服装一致。

但这并不能说明这张照片就一定是1971年5月1日晚上的镜头，因为毛主席、林彪在那几年的衣服基本没有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新闻电影没有西方那种新闻理念，拿以前的电影资料充数是家常便饭，包括图片也是这样。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家都知道的“换头术”事件：陶铸主管中宣部时，审查国庆17年新闻照片时，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指示加上去，新华社用技术处理，把邓小

¹ 萧奇明：《亲历「九一三」》，《军休之友》，2006年7期。

² 王飞 1972.1.5 交代，见总政林彪案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 1980 年 8 月编《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1970 年 3 月至 1971 年 9 月）》。

平的头像加到另一位领导人的头上。这样的“换头术”都干得出来，把以前的照片或影片拿来充数更不在话下。

如果是当天拍的照片，应该按照顺序，群众欢迎毛主席、林副主席走上天安门城楼，应该是第一张，然后才是毛主席、林彪坐下的镜头。而《人民日报》这两张照片，先是坐下来，再是欢迎，这不是颠倒了吗？这只能说明第二张照片是“借”来的。

除了5月2日那张照片外，可以肯定，1971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林彪手拿语录和毛主席相视而笑、亲切交谈的照片也不是当天的镜头。那天白天是游园，天安门广场并无活动，不可能有毛主席、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镜头。197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林彪手拿语录，毛主席指着前方的图片，也不是当天的镜头。1971年的五一、七一、八一天安门广场白天都没有集会。《人民日报》上这些照片应该都是以前拍摄的，那时照片没有时效性，只讲政治需要，常常把以前的照片拿来顶替。

《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记录片会不会也是如此呢？该片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与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片头是“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记录了1971年“五一”节当晚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过程。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片长25分钟，其中15分钟是天安门焰火晚会。第一个镜头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其他领导人没有随从，毛主席似乎是先期到达城楼中央的休息室，与外宾在一起等候。第二个镜头是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由西侧走来，军人列队欢呼。毛主席招手致意，林彪左手按着没有系扣的大衣，右手举着毛主席语录，笑容满面，林彪的表情看上去轻松愉快。第三个镜头是由时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王海容引导，西哈努克夫妇等外宾从休息室出来与毛主席、林彪握手。毛主席与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克·威尔科克斯握手时，林彪在毛主席旁边伸手待握，面向镜头的维克·威尔科克斯被工作人员引走，镜头切换。

根据资料，维克·威尔科克斯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从1951年起担任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从1959年国庆十周年首次来到中国起，1963年5月，1965年3月，1967年3月，1971年5月，1973年3月多次来华访问。

1971年五一晚会，维克·威尔科克斯在天安门城楼上，但并没有拍到他和林彪在一起的镜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录片中的维克·威尔科克斯应该是以前的镜头。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镜头。天安门城楼上主桌五人，自东向西：毛主席、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西哈努克夫人，林彪。翻译齐宗华坐在毛主席、西哈努克

亲王身边翻译。而林彪则笑容满面，没有低着头情绪低沉（和杜修贤拍的照片截然不同）。再一个镜头礼花燃放，主桌上却变了位置，董必武、林彪不见了。自东向西，周恩来坐到毛主席的位置上，与西哈努克交谈。毛主席则坐在董必武的位置，旁边是齐宗华、西哈努克夫人。毛主席、周恩来不可能在同一场景互换座位，这充分说明这一组镜头是将不同时间的镜头剪接而成，并不是当天的镜头。林彪经周总理电话催促才起身，去晚了，不可能拍到欢迎场面。而且当时林彪情绪低沉，不会笑容满面。

正因为林彪的迟到早退，所以这个五一晚上没有拍到林彪和毛主席在一起的镜头，电影没有拍到，电视也没有拍到，周总理才发了火。关于周总理发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好几位老摄影师都说记不清楚了，那一段上天安门城楼的次数太多，也或许是不愿意谈“走麦城”。八一厂副厂长王程帆那时是纪录片摄影师，他说他碰到过一次总理因摄影对象没拍上发火。他记得好像是江青提前走了，没拍上，大家都在注意拍毛主席。最后由编导把以前的片子编进去。周总理有可能为没拍上林彪发火，不可能为没拍上江青发火，江青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镜头有那么重要吗？我记得有一次江青想发表她和毛主席的照片，让毛主席否定掉了。而且那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根本没有出现过毛主席和江青并排的大照片。很可能是王程帆记错了，不是没有拍上江青，而是杜修贤说的没有拍上林彪。

五一节晚上叶群与毛主席谈话

1971年五一晚会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确实没待多长时间，林彪很快回来了，叶群没有一同回来，她留下来与毛主席谈话。邱会作说：“叶群很机灵，她抓住这个机会，跟着毛主席进休息室去了。毛主席同叶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叶群说：‘主席同我谈得很好，谈笑风生地和我说了很多问题，还是和对我报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没有加新的东西。’”¹

叶群那天晚上回来非常高兴。

五一节晚上，叶群把见毛主席的情况告诉黄、吴、李、邱。叶群说：“同主席谈得很好”，毛主席批评黄、吴、李、邱“对林彪帮忙不怎么高明”。叶群解释是“帮了倒忙”。叶群还说，别的没有什么事，要黄、吴、李、邱宽心²。叶群认为谈得很好，毛主席原谅她了。从事后的发展看，并不是那么回事。

在北京的最后这段时间里，因为毛家湾在装修，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

¹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78 页。

² 吴法宪 1972.2.11 交代，邱会作 1972.3.15 交代，原载《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 1970 年 3 月至 1971 年 9 月》，总政林彪案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 1980 年 8 月编。

而叶群自认为检讨在毛主席那里过了关，心情轻松许多，还亲自到文物管理处“选购”文物。

同时，叶群加紧筹划儿女婚事。

林彪最后一封没有发出的信

“九一三”事件后，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曾带人从毛家湾查抄到林彪 1971 年 5 月 23 日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毛主席：5 月 20 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它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 38 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

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此致敬礼。

林彪这封信是如何成稿的我不知道。但林彪对我讲过这封信的内容，尤其是“四不一要”，给我的印象深刻。

对这封信，我记得林彪曾把我叫来，口授了信中的主要内容“四不一要”。“四不”是“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一要”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林彪边想边说，我拿一张白纸记录下来。

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身边有四位秘书：我、王焕礼、李春生、宋德金，还有一个保密员李根清，他们都能帮助林彪记录。王焕礼是庐山会议后调来的，宋德金也是新秘书，主要负责读书。他们两人都没有上庐山。我和李春生上了庐山，而林彪并不知道李春生也上了庐山，只知道我上了庐山，加上我是老秘书，所以林彪有什么事爱找我去办，还几次表示他“想见毛主席”。

林彪给毛主席这封信里的“四不一要”是林彪的意思。从庐山上下来，叶群忐忑不安，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也都忐忑不安，不知道毛主席要怎么处置他们。尤其是叶群，老在林彪身边讲怕被弄到农村去之类。林彪为了安慰叶群，曾叫李根清给叶群写一个条幅，最后一句话是“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并让挂在叶群屋子里。

我记录“四不一要”时叶群不在场，我记录后林彪并没有让形成信。形成信恐怕是叶群的意思。所以我并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我认为，林彪不可能亲自写过这封信。林彪后期连画圈都嫌累，批几个字都要工作人员模仿，决不可能写这么长的信。

这应该是叶群张罗的结果，至于叶群让谁整理的我不知道。叶群在庐山“翻了车”，她的“原则”是不知道“庐山”情况的秘书坚决不让知道相关的事。很可能像叶群的两次检讨一样，是叶群找军委办公厅的人捉的刀。

这封信为什么被林彪压下来了？据查抄出这封信的吴忠说：“林彪深思熟虑，反反复复，授意、起草、修改（这封信），抄清以后还放置了三天，考虑送还是

不送。林彪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有这个必要吗？’于是林彪把这封信压下来了。”最后，林彪没有送出这封信，叶群把它锁在她的保险柜里。

林彪这封没有发出的信表明林彪没有野心。他建议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把四野嫡系 38 军调走，一切听从毛主席的，让毛主席放心，他没有反对毛主席的意思，更不想动武。

“九一三”事件后，没有批判这封信，也没有在毛家湾工作人员中调查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因为从林彪的这封信中看，林彪没有任何想反毛主席的意思，而是表达了“投降”之意，希望退休，希望不要抓黄吴李邱。如果林彪地下有知，黄吴李邱及千千万万他的老部下，在“九一三”事件后不仅被关押十年，还被判了重刑，不知他作何感想？！

林彪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林彪很少参加外事活动，他不喜欢迎来送往这些事情。与越南、阿尔巴尼亚外宾会谈，他对越南客人说了一句话“熬就是胜利”。林彪见阿尔巴尼亚巴卢库等外宾仅寒暄了几分钟，照了几张相。巴卢库和林彪礼节性地拥抱，林彪感觉像遭受一场“天灾”，回来说：“跟洋人打交道真受不了！”

6月3日9时30分至10时40分，林彪陪同毛主席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以及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这是林彪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有人说林彪在这次会见时不辞而别，这似乎不可能。这次随林彪外出的仍然是警卫秘书李文普，我没有听他谈起林彪的“不辞而别”。

林彪多次想与毛主席面谈，是毛主席不想与林彪谈，而不是林彪不想与毛主席谈，所以林彪没有任何理由“不辞而别”。当时的新闻纪录片和照片也可以证实，林彪“紧跟”在毛主席身后，表情如往日一样淡然。

有人披露了毛主席与齐奥塞斯库的谈话记录，主要是毛主席和齐奥塞斯库交谈。林彪有过两次插话，一次是在谈话刚开始，一次是谈话即将结束。一开场，毛主席说到教育革命：“……这就要时间，慢慢来，已经多年了。”林彪插话：“21年了。”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说起“反修”要坚持“一万年”，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罗马尼亚波德纳拉希先后来访各减了“一千年”。毛主席说：“哎哟，一下子减少了两千年，再减非常危险啦，现在不过只剩下八千年啦。”齐奥塞斯库提出：“还可以减少一些吧。”毛主席说“一年都不减了”。“就是说，你们顶了一下，就少了一点吗？我们不多不少，八千年。大家听着呀，不再减少！”林彪

插话：“坚决不减。”毛主席说：“你看，‘军阀’说话了，他是‘军阀头子’，我也是‘军阀’……”

从这个谈话记录看，林彪应该没有提前离开会场。

我记得李文普那天回来给我们讲笑话：“你说老先生（林彪）陪同主席会见外宾，他搬把椅子坐在门外，睡着了。”李文普还学着林彪打瞌睡的样子，说：“人家都走了，他还在那里睡觉。”

林彪这次会见外宾后，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林彪要求在客厅写三条“万岁”标语

7月初，周总理要来毛家湾看望林彪，约定下午到。林彪吃过午饭，叫内勤把李根清找来。林彪说：“小李，下午总理要来，你给我写几句话，用红字写，字大一点，醒目一点。”林彪用手一指，“贴在客厅门口。”这是林彪最后一次叫李根清写字。之后不久他和叶群就去了北戴河。



林彪的西客厅很大，一进门是一面墙，有两平方米左右。李根清坐在茶几旁，准备好纸笔，林彪一边来回散步，一边说：“写‘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

岁’。”（上图：“林办”工作人员合影，左起于运深、郭连凯、吕桂民、叶群、关光烈。）

林彪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三条标语呢？

李根清没有上庐山，庐山会议的文件也没有印发，所以他对庐山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不知道揪出了陈伯达，也不知道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李根清心中，始终认为毛主席和林彪是密不可分的。他实在不明白周总理要来，写这三条大标语干什么？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当然李根清不能问。他找来一张一开大的纸，横着对半裁开，用很粗的油画笔，蘸着广告红色，按照林彪的要求，很快用美术字写成三条大标语，字写得很

大，很醒目。然后他用图钉按到林彪西客厅进门处右侧的挂衣板上。这个位置是进入林彪西客厅的必经之处，只要走进林彪西客厅，肯定能看到这三条大标语。

林彪特意让周总理看这三条大标语，或许希望周总理能在毛主席面前替他说说话？总之，林彪想通过这三条大标语，表示他是拥护马列，拥护毛主席的，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在我的印象中，毛主席和林彪的关系非同一般。毛主席欣赏林彪，也提携他，经常推荐一些书让他看。林彪非常尊重毛主席，记得 1966 年 9 月，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期间，毛主席把自己看过的《刘晔传》、《三国志》里的“郭嘉”篇推荐给林彪看。郭嘉是曹操谋士，诸葛亮式的人物，对曹操打胜仗出了很多主意，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毛主席为什么向林彪推荐郭嘉？林彪从来没有说过。据我所知，林彪写信给毛主席谈了读“郭嘉”的感想。

林彪最后一次去北戴河

北京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没有参加。周总理几次动员林彪出席，讲讲话，林彪都没有回应。但实际上，林彪并不想与毛主席为敌，他还是很想与毛主席谈谈的。

我们秘书都知道，林彪多次想见毛主席，而毛主席那边一直不置可否。

李文普回忆：“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见主席谈话。当时，毛主席那边电话至少是叶群打，我们‘林办’有传闻，林彪想与毛主席见一下，谈一谈。但是长时间毛主席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记得庐山会议后，有一天叶群开会回来，要看《何典》这本书，说是毛主席推荐中央政治局委员看《何典》。《何典》中有两句话：“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句子都被制成卡片，林彪怎么理解，我们谁也不知道。

1971 年 7 月 17 日，林彪、叶群离开北京去北戴河。林彪可能一直在等待毛主席召见，但始终没有等到。天气越来越热，不得不往北戴河去了。

这次我没有去北戴河，在北京留守。行前，叶群对李文普说：“首长（林彪）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如果黄（永胜）、吴（法宪）他们斗得不好，11 楼（江青）来找首长（林彪）反映情况不好办。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

叶群使用专机就像使用专车

林彪、叶群离开毛家湾的那些天一切如常。

8月5日，叶群回北京301医院检查身体，第二天凌晨结果出来了，专家会诊排除了乳腺癌。叶群活跃起来，在毛家湾接待了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吴法宪后来在中央专案组交代叶群说到政变，而邱会作则坚决否认。此事一直没有定论。1980年审判“两案”时，吴法宪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叶群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政变问题。

8月16日，周总理、黄永胜、张春桥、纪登奎奉毛主席指示去北戴河见林彪。林彪作“加强战备训练”的指示。

而就在这一天，毛主席南巡到达武汉，与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等人谈话。

8月23日，刘丰把毛主席在武汉讲的不要让自己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办公室主任的内容，透露给林彪侄子林汉雄¹。很快叶群也知道了。“九一三”事件后林汉雄因此坐了四年牢，但查来查去，没有查到林汉雄与“九一三”事件有任何关系。

8月28日上午，于新野、李伟信、许秀绪坐火车去北戴河。林立果从北京打电话给李文普，说：“北京这里形势对她（叶群）不妙”，“老李你作点准备，首长（林彪）准备在9月18日左右去广州，不要跟别人讲。”

8月底，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谈了“老婆专政”问题，要军委办事组给她在总参政治部或军委办公厅安排一个工作，她不当林彪办公室主任了，要吴法宪同黄永胜商量。

9月3日上午，林立果在毛家湾对“林办”工作人员王淑媛说：“宁可逃跑也不像刘少奇那样被抓住坐牢，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

9月6日晚20时半，叶群给胡敏打电话，要胡敏动员张清林、张宁来北戴河。叶群还专门找林豆豆通话，要林豆豆和张清林当晚去北戴河。林豆豆推托身体不好，过几天再去。叶群发了火，骗她说：“你这么大架子，爸爸请你，你都不来。现在他病得快死了，还没有见过张清林。见到你们的事定下来了，他的病就会好了。”林豆豆只好同意了，她哪里想到，这次去北戴河，遭遇了“九一三”事件。21时许，叶群叫李文普要胡萍安排飞机送林豆豆等人来北戴河。

按胡萍的说法，叶群使用专机就像使用专车一样，召之即来，来之即走。可是飞机怎么能是汽车？不要说专机，就是普通飞机，起飞之前也要有相当的准备时间，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汽车。汽车在地上跑，随时可以停下来，飞机在空中飞，万一准备不好是要机毁人亡的啊！看来叶群在9月13日凌晨火烧眉毛般爬上飞机，也是出于这种使用专车的心理吧。因为专机夜航不安全，当晚并没

¹ 林汉雄，是林彪堂兄林育英（张浩）的儿子。

有安排。

9月7日上午，我按叶群的要求，把林豆豆、张清林、张宁送到西郊机场。9时50分左右，叶群叫内勤孙忠堂通知秘书李春生，立即给毛家湾打电话，把《俄华词典》、《英华词典》，以及俄语、英语会话等几本工具书，交给林豆豆带到北戴河。而这时，离飞机起飞只有十分钟了。

没办法，为了等毛家湾把叶群要的书送来，飞机推迟了一个小时起飞。

11时40分，林豆豆、张清林、张宁等坐飞机从北京到北戴河。

叶群要林豆豆一定到北戴河的理由，说是要让林彪看看儿女的对象。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没有更多地想。

林豆豆等人走后的几天中，毛家湾一切如常。

林立果给我看“林彪手令”

9月8日，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老虎回北京治牙，要严格保密”，并叫我联系301医院口腔科。

“九一三”事件前夕，林立果曾以治牙为名，三次回到北京，两次我都见到了他，因为叶群交代我替他联系301医院口腔科治疗牙齿。

1971年8月27日上午，林立果带刘沛丰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治牙。下午，叶群三次打电话找林立果。

9月2日中午，林立果再次到301医院看牙。9月4日傍晚飞回北戴河。

9月8日20时，林立果第三次从北戴河飞回北京看牙齿。他在西郊机场落地后，由周宇驰陪同，回了一趟毛家湾。这天是我在毛家湾值班。林立果到毛家湾的时间是21时30分，他打电话到北戴河向叶群报了平安，并对我说第二天去301医院看牙。我说已经与301医院口腔科联系好了。听他说牙还在痛，我还关心地询问了几句。

第二天林立果确实去301医院口腔科看了牙齿，拍片、验血，两天后检验报告才能出来。

林立果当晚没有住在毛家湾，他在毛家湾停留的时间不长，从他房间里拿了东西就走了。我一直陪在林立果的旁边，并跟他去了他的房间。林立果对我说，如果有他的电话，就找空军一号台。

在走廊上，林立果从白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16开白纸让我看，这就是后来说的“林彪手令”。我记得上面用红油笔竖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没有章。看来这张白纸就是在怀柔直升机现场被周宇驰撕碎的那张，由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搜集上交，1972年7月2日，由中共中

央中发[1972]24号文件公布，但公布的“林彪手令”缺失三分之一以上的字迹。

我看“林彪手令”时，是边走边看，看得不是那么仔细，我感觉像是林彪的字迹。林立果并没有说明这张纸条的意思，我也没有问。

我在“林办”七年，对林彪写这样的纸条早就习以为常了。林彪写字喜欢用军委办公厅服务处发的那种白纸，没有天地，用铅笔写，后来用红油笔了，字的大小一样，没头没尾，一大张纸就写几个字，只有一句话。例如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手令“立即放出邱会作”。

林彪高兴时，“哄”他写个条子很容易。据我所知，叶群、林立果都找林彪写过。我当时并没有把林立果让我看的这张纸当成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没有琢磨这个纸条的含义。我当时认为林立果又和叶群闹什么矛盾了，所以林彪才写这样的纸条。

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个“手令”是写给谁的？按什么“命令”办？为什么只有一句如此含糊的话？林彪口述一般都非常具体，而这个“手令”太含糊，没有确定性，“盼”照“什么”办？不知道。而且用了个“盼”字，不像林彪一贯下命令的口气。林彪一生中从来没当过副职，下命令从来是死命令，坚决果断。“盼”有乞求、祈使、商量的意思，这倒像没有当过主官的林立果的口气。

1972年5月，林豆豆在玉泉山被审查时，曾让她鉴定“林彪手令”的影印件。林豆豆认为，“林彪手令”像林彪的字体，但更像是模仿。她说“像”，不说“是”，并始终拒绝写旁证材料。

据我所知，叶群不仅让李根清模仿林彪字体批字，她自己和林立果都在模仿林彪字体。叶群学在前，她借口为了在关键时候起作用。林立果说：“主任学，我也学。”“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林立果）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林立果拿的这个“林彪手令”转来转去，最后还在周宇驰手里。

“九一三”事件关于林彪的唯一证据就是这个“林彪手令”。以后我才知道中央专案组如此看重“林彪手令”。见过“林彪手令”的人比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人多，《五七一工程纪要》我在“九一三”事件前根本没有听说过。1980年审判“两案”有关部门将直升机迫降现场搜集到的部分碎片拼对复原，拍成照片，出现在法庭上，作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铁证”，以后又被公开在报刊上。这个“林彪手令”的字迹是“竖版”¹。而1999年，林彪老秘书关光烈说，他见过的“林彪手令”是“横版”。“两案”并没有注意到“林彪手令”有两个。这也不奇怪，因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驰，再没有人同时见过两个“林彪手令”。

“林彪手令”的内容能证明林彪试图谋害毛主席，另立中央吗？为什么出现了两张甚至三张“林彪手令”？林彪案审了十年，成千上万的案审人员为什么不

¹ 参见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43页。

对林彪的唯一证据下功夫侦查，搞清事实真相呢？

叶群最后一晚两次给我打电话

1971年9月12日，是我在林彪办公室工作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轮到我在毛家湾值班，也就是说，我是最后一个在毛家湾值班的秘书。

林彪、叶群到北戴河后，留守毛家湾的只有两个秘书，王焕礼和我，所以隔一天我就要值一个班。我曾仔细想过，这最后一天收发了哪些文件，接了哪些电话，却实在记不起来了。

中午12时左右，叶群让李文普通知李春生，给毛家湾打电话。李春生立即给我打了电话，说主任（叶群）要家里把文件分好类给她送来。我没有午休，立即将近日送来的文件打包，准备托飞机送到北戴河。前一天叶群在听李春生报14件副军以上干部的任免报告时，要李春生打电话给毛家湾，把副军以上的干部名册送来，还让把部队部署情况的登记表也一起拿来。后来叶群又要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文件。这些文件我都送到北戴河了。叶群走得匆忙，这些文件一份也没有装到飞机上带走。后来清查毛家湾的工作组说，所有“林办”的文件一份也不少。（下图：于运深与夫人王淑琴2006年合影，王淑琴在叶群身边做过保健护士。舒云摄）

9月12日16时多，林立果回毛家湾洗澡，他提前打电话要警卫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烧洗澡水。警卫部队除执行住地警卫外，还负责警卫对象家中的水暖供应。林彪家中的游泳池管理和冬天



供暖气，夏天送冷风，都是由警卫战士负责。林立果没有找我，我也没有见到他，他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

毛家湾这边很正常。

这个晚上，是林彪、叶群的最后一个晚上。叶群在北戴河操持给林豆豆、张清林办“订婚仪式”。叶群说过准备国庆节给女儿办婚事，我们毛家湾的工作人

员都知道。

晚上，我接了叶群两个电话。这两个电话之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深刻，因为这是我被关起来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处理的最后的工作。

21 时多，叶群给我打来电话，打得很长，足讲了十多分钟，都是小事。叶群主要谈林豆豆的婚事，又说到毛家湾修小厨房，到大连做衣服等。叶群说他们先到大连，然后回来过国庆，叫家里收拾好卫生。还说在上海做的尼龙外套破了一个洞，让上海空四军管理处处长过全找人织补一下。叶群打电话向来很长，说了很多事。叶群侃侃而谈，与平日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在电话里还笑声不断。我根本没有感觉她有什么慌乱，或者有马上要离开北戴河的意思。

总之，我丝毫没有感觉出叶群的紧张和异常。

我向叶群请示了一些别的事情后，问叶群毛家湾养的那几只乌龟怎么处理。管理员童显华对我说，有几只乌龟养了很长时间了，死了担不起责任，问怎么办。这种事情我不能擅自处理。叶群当时没有答复，过一会儿，叶群第二次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把这些乌龟送到钓鱼台，请江青同志吃。”乌龟是大补之品，叶群细致交代要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最后没有送成，当天半夜毛家湾就被围起来，我失去了自由。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被集中到“亚疗”后，面对面排查，我听说 9 月 12 日的这个晚上，在北戴河的叶群“忙”得不行，不停地打电话。叶群放下我的电话，又与邱会作夫人胡敏聊了一个多小时，聊的中心内容是林豆豆的婚事。胡敏则插空聊起出生不久的孙女，叶群说你孙女的名字起得好。

9 月 12 日的晚上我就睡在办公室，我差不多是在零时左右睡觉的，睡觉前毛家湾一切正常，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北戴河那边有什么异样。

“九一三”凌晨毛家湾房顶有沉重的脚步声

林彪专机在 9 月 13 日零时 32 分起飞，我一无所知。

9 月 12 日晚上，我接完叶群的两个电话，又处理了一些杂事。然后我洗了一个澡，又洗了衣服，把衣服晾在院子里。

这时夜已深，我很快睡着了。睡梦中我忽然被屋顶上的又急又重的脚步声惊醒。奇怪，谁敢上毛家湾的房顶？因为外面有层层警卫，而且毛家湾还有施工人员。我不能离开办公室，所以我没有出去查看。说实话，我也没有太当回事，接着又睡了。

以后才得知留守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遵照团长张耀祠的命令，在林彪专机起飞后就布置守卫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上了房顶，

占领了毛家湾的制高点¹。北戴河林彪别墅也不例外，被严密封锁了，警卫瞬间成了看守。

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排名在毛主席之后，由中央领导人中的第六号变成了第二号，中央警卫团负责警卫的部队就由六中队改成二大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副大队长有两个，于仁堂和蒋廷贵。因为北戴河还有中央警卫团的八大队负责外围警卫，所以林彪到北戴河，一般都是姜大队长和于副大队长带小部分官兵随卫，蒋廷贵率大部分部队留守毛家湾。林彪最后一次去北戴河，仍是这样安排。

所以“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我听到房上有重重的脚步声。

大约半小时后，蒋廷贵又接到张耀祠的第二个命令：“林彪办公室的秘书，现在在班上的，不准离开。不在班上的，明天就不再上班了。告诉他们在家听候通知。从现在起，不管什么地方送来的文件，秘书只准收，不准拆阅，也不准向外发送文件，机要室的钥匙要他们交出来，由你保管。你现在就去向值班秘书传达，并要求他们坚决执行，派一名干部带一名战士在现场监视。”

天亮了——9月13日的早晨。

我去院子里收昨晚晾的衣服。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在值班室外，不让我出门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钓鱼台又在搞什么事端？我大发脾气，林彪办公室的工作耽误了怎么办？警卫战士仍不放我出门，说这是上边指示。

我无可奈何，只好退回屋里，什么也不让我干。我想不出会出什么事情，做梦也不敢想林彪会出事。

蒋廷贵向我传达张耀祠的指示时，我几乎“傻”在那里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实在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神来，问蒋廷贵：“这是谁说的？谁叫你们这样做的？副统帅的办公室连着全军，一天有多少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处理，耽误了你们能承担得起吗？”

蒋廷贵说：“对不起，我是奉命行事，请你务必配合执行。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还得留两名同志在这里，希望你配合照办。”

我又问：“这是谁的命令？”

蒋廷贵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

因为张耀祠不仅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也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我一听也就不说什么了。我知道，张耀祠是毛主席身边的人，难道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我不得不服从，人家双枪，还上房架了机枪，不让我进办公室，我就进不去。无论如

¹ 参见蒋廷贵文 舒云整理《北京毛家湾的九一三之夜》，原载《新史记》2011年第4期。

何，晾在院子里的衣服由他们替我收回来。

以后几天，他们不让我出屋，文件也是只收不发。

之后，我就和“林办”所有工作人员一起，被“囚禁”近四年。

【史实考订】

吴忠带人查获《“571”工程纪要》之说靠谱吗？

蒋 健

军事科学院的曲爱国将军曾经撰文说：在两次提审“九一三事件”中乘直升机叛逃未遂的李伟信之后，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工程计划”的要点草稿，即《“571”工程纪要》。¹

《“571”工程纪要》到底是如何查获的？

但是，当时与吴忠一起领导、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行动的吴德则说：9月13日“当天晚上，吴忠审问了李伟信。李伟信交待说他们有一个《“571”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他当时只是想审清楚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想不到他们还有个滔天大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李伟信说：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我们那时都在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后对我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吴德并没有说过是吴忠亲自带人查获《“571”工程纪要》的，而且吴德还说：“《‘571’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571’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571’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

李德生的回忆印证了吴德的说法。李德生说：大约在9月17、18日，也就是他到空军学院做揭发动员报告后不久，“林立果秘密据点的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来得及带走的。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我看了发现内容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它分析了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和力量，提出了政变口号和纲领，规定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

¹曲爱国：《百战将星——吴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383页

等。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怎么写出来的。我派人提审李伟信，问他是怎么回事。李伟信交待，这是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于新野在上海按照林彪的旨意，拟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纪要》，本子里面的内容，就是于新野当时手记的政变纲领。我把原件和李伟信的交待很快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转呈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林彪罪行的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¹更重要的是，吴忠本人只是说：“审讯中李伟信讲过有个《“571”工程纪要》，引起我注意，我以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个工程上的东西，没承想是一个政治问题材料。”吴忠根本没有说是他带人查获《“571”工程纪要》的。²

当然，最重要的是《“571”工程纪要》的发现者，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王兰义本人的“交待”。采访过1980~1981年“两案”审判的《解放军报》高级记者邵一海依据王的“交待”撰文披露：9月“13日下午下班的时候，老王拿着当天的报纸，送到小楼去。同往常一样，他把报纸放在门口石阶上，用石块压着，就转身走了。”9月14日“晚上7点半，他又去送报纸。到楼门口一看，昨天晚上送的报纸，还在原地放着。楼内黑黑的，楼门掩着，没有上锁。”出于保守小楼机密的考虑，老王离开时给楼门加了锁。当晚10点，“他又到小楼看了一眼，依然如故。”15日“晚上7点半，他又去小楼送报纸。看到小楼的一切仍同昨晚的一样：门还是他昨晚锁上的……。他考虑再三，决定不顾不准进屋的规定，进去看看。”老王开锁进楼后，“一片凌乱的景象，呈现在他的眼前。”随后他去办公室向一个负责小楼工作的人汇报了情况，然后找来两个人整理房间，稍后另两个负责小楼工作的人，即时任空军学院副政委的王治松和时任政治处主任的高文勇，也来了。他们三人翻看了餐桌上放着的书本，其中就有写着《“571”工程纪要》的红色封面拉链本。之后，“他们把看过的本子仍旧放在原处，大概是要让它等待自己的主人吧。”这三人经过商量，先后打电话找过于新野、程洪珍和刘世英，前二人不在，刘世英只是冷冰冰地回答：“等他们回来再说吧！”那个“罗列了一些条文”的拉链本“使他们心神不宁。他们多次商量，要不要把这个本子拿出来。16日晚上8点，他们终于下定了决心，让人摸黑进小楼去，不开灯，不打手电，把这个本子拿出来了。”“但是，中央已经发现了小楼这个反革命据点。17日，党中央、周总理派人来到学院，调查小楼情况。老王的心情更加紧张了。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本子，更加成了累赘。他们一会儿让这个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保存，一会放在办公室，一会放在家里，不知如何是好……10月6日晚上，他们听到了‘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一个比他们可能想象到的还要严重得多的事实，无情地摆到他们面前。10月7日凌晨，老王终于把这个本子交给了学院

¹ 《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429页

² 吴忠口述，陈楚三、李大震整理：《吴忠谈“九一三”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1期，24页

的组织。9日，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一份材料，经过空军领导，送给了周总理。”

1

事实胜于雄辩，《“571”工程纪要》的查获与吴忠完全无关。

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是何时被查封的？

另外，曲爱国还在同一本书中提到：

9月13日凌晨3时多，周恩来向吴德和吴忠正式下达五条命令，其中的第三条命令是“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凌晨4时左右，吴德和吴忠回到了卫戍区。”随后与卫戍区政委杨俊生一起“共同拟定了紧急战备状态的部署方案，决定：卫戍区机关和部队马上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全员发动，全面准备，严密组织，就地待命，确保一声令下，迅即出动。”之后，“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吴忠亲临现场指挥官兵细致检查，获取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重要罪证。”而且，“到13日晨曦初露时，卫戍区部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北京已经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²

也就是说，按照曲爱国的描述，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在9月13日的早晨已经被查封并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

既然如此，那么在这之后，王兰义、王治松和高文勇等人怎么还可以多次自由出入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并发现了《“571”工程纪要》呢？

笔者认为，显然是曲爱国搞错了林彪集团5个黑据点被查封的时间。

理由如下：

首先，无论是吴德，还是吴忠，他们本人的回忆都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其次，无论是吴德、吴忠，还是周恩来，当时都不可能知道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所在，怎么可能派人立即去查封呢？

第三，根据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的回忆，他和李伟信的弟弟李伟军，按照约定，在9月13日上午没接到李伟信的电话后，于当日离开位于东交民巷的空军招待所，即“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之一，坐火车回上海。而这个“黑据点”离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以及吴忠的家可以说近在咫尺，是最该查封也最好查封的一个据点，可结果呢？这就表明曲爱国所说的9月13日早晨“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严重违背事实。

¹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1988年，100-106页

²《百战将星——吴忠》，374，375，377，378页

第四，众所周知，除了和两架外逃飞机直接相关的人以外，没有一个林立果小舰队的成员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就被扣押的。鲁珉是9月14日中午去向李德生自首的¹，江腾蛟是9月14日下午被王辉球派人从家里叫到办公室后坦白的，小舰队其他成员都是在此之后的几天陆续被捕的，有的还是在他们安全抵达广州以后才被拿获的。实际上，所有的小舰队成员都不是在“5个黑据点”里被扣押的，仅此就可表明曲爱国的“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这种写法带有很大的演义成分，完全背离历史真实。

第五，吴德回忆：9月13日早晨，“我们派出卫戍区的部队封闭了北京的西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东郊机场共五个机场。……进入机场的部队在机场空军的配合下，完满地完成了任务”。假如周恩来当时真的下令卫戍区部队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那么他一定会通知空军予以配合，就像他命令卫戍区部队进驻机场时会要求空军予以配合那样。不然，卫戍区部队与“黑据点”所在的各个空军单位的警卫部队发生误会和冲突怎么办？从王治松和高文勇这样的空军学院领导当时的表现来看，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卫戍区部队来查封他们单位内的林立果“黑据点”这回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吴法宪的回忆提供的史实：9月17日“晚上，梁璞告诉我，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在空军各直属单位还有五个据点：一是西郊机场，二是空军学院，三是高级防校，四是东郊民巷空军招待所，五是干部休养所。他们在前三处专门修了房子，其中空军学院和高级防校的房子还修得特别好。我立即将林立果在空军修建据点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随后指示要北京卫戍区派人对这些据点进行检查和查封。”²吴法宪的说法把时间、人物、地点和背景交代得很清楚，而且与王兰义的说法、邵一海的调查以及其它确凿的事实相吻合。

曲爱国的说法有依据吗？

综上所述，无论是“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还是“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工程计划’的要点草稿”，都背离事实。

那么，曲爱国书中的这部分内容又来自哪里呢？曲爱国1983年夏大学毕业后入伍，时年21岁。而吴忠将军晚年生活并不顺遂，曾经受到长达8年的审查，并于1990年2月因车祸去世，所以他生前不可能接受曲爱国这样陌生的“小同

¹ 《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427-428页

²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873页

志”的采访，否则，曲爱国的书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谬误。

难道曲爱国该书的《风云“九一三”》一章是凭空而来的吗？

那倒不是。笔者认为，曲爱国在写作这一章时参考了吴德口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发表的《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一文。比如，吴文中有一段相关内容如下：

“随后，周总理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

“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也就是直接报告毛主席、周总理。

“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也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

“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¹

而曲书中的类似内容如下：

“简短的讨论之后，周恩来归纳所开列的措施，正式下达了命令：

“一、卫戍区部队立即协同民兵，严密搜索外逃的直升飞机，要人、机并获，并将搜缴物品直接报送中央。

“二、卫戍区部队立即出动，严密封闭北京的所有机场，没有中央的命令，任何飞机不许起飞和降落。

“三、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

“四、卫戍区立即向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附近地区增派部队，协助中央警卫团，确保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同时，加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的警卫力量。

“五、首都所有驻军进入一级战备，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²

对比吴文和曲文可以看出：曲文中的一、二、四、五条由整理吴文中的一、二、三、四条而来，核心内容未变，但曲文中的第三条则是他塞进去的私货。

另外，吴文中“林立果他们在京有五个据点，……，吴忠对全部据点都查看了”³这部分内容并没有涉及具体的时间，但被曲爱国想象成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吴忠亲临现场指挥官兵细致检查，获取了林彪反革命集团

¹ 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54页

² 《百战将星——吴忠》，374-375页

³ 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57页

的大量重要罪证。”

至于曲爱国为什么要这样写？笔者认为，美化传主是国内传记作者的通病。只不过，曲爱国在这里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罢了。

【阅史漫笔】

林彪事件中的两个谜团

舒 云

谜团之一：《“571”工程纪要》的发现

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中说：“中央在审查林陈反党集团案件中，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证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197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中对《“571”工程纪要》的注释是：“林彪及其死党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10月内部版，第668页）

按权威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 - 1978）》的说法，《“571”工程纪要》是“1971年3月21日至24日，林立果在上海秘密据点召集‘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密谋。……根据他们讨论的结果，于新野执笔起草了准备进行武装政变的《‘571’工程纪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 - 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44页）。在“九一三”事件中，《“571”工程纪要》是有关“反革命政变”最重要的证据。

可是，毛家湾、北戴河等林彪住地，为什么都没有搜查到《“571”工程纪要》？

为什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林彪看过《“571”工程纪要》？

它和林彪到底有什么关系？

更为蹊跷的是，《“571”工程纪要》是何人、何时、何地发现的？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571”工程纪要》的发现地点

说法一：在北京空军学院发现。

1971年11月14日晚上，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地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等。谈话中间，周恩来请示毛泽东，《“571”工程纪要》是否可印发大军区和省委常委，毛泽东表示同意。同日中共中央将其影印本编号印发，中共中央通知中说：中央在审查林彪反党集团案件中，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表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第418页）。中共中央在审查林彪案件中，从林彪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571”工程纪要》。毛泽东看后，认为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阅”（《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第429页）。

说法二：在怀柔县直升飞机迫降现场发现。

有权威人士的回忆中称，在周宇驰自杀后，从迫降在怀柔的直升机上缴获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政变的全部罪证《“571”工程纪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第113页）纪登奎回忆：那架直升机上面有包括《“571”工程纪要》在内的“林彪反党集团的全部罪证”。（王灵书《纪登奎与我的一次谈话》，原载《瞭望周刊》1989年第21期，第44页）

《“571”工程纪要》到底是在直升机现场还是空军学院发现的？

《“571工程”纪要》的发现时间

说法一：9月14日。

有人说是在9月14日，给林立果送饭时发现已人去楼空，在一片灰烬中突然发现茶几上有一个本子，经过激烈思想斗争上交了（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说法二：“九一三”以后几天内。

李德生回忆：大约在9月17或18日，“林立果秘密据点的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来得及带走的。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页）这个说法得到吴德的证实：“《‘571’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571”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吴

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56页）

说法三：9月15日。

据空军学院干部王兰义回忆：9月13日上午，我带学员到房山东方红炼油厂参观。下午回来我先到办公室，看没什么事，取了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门口台阶上。9月14日19点30分，我再去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露出一条缝，……我把楼门锁上。9月15日白天，我有事外出，19点30分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进去看看。拉开门，恶臭扑面而来。正是大热天，鱼长了一两寸的毛，满屋臭味。茶几上有几个本子，其中红色拉链本里黑墨水写着《“571”工程纪要》。……10月5日晚，李德生传达中央57号文件，会后我从家里把“本子”取来交给他（舒云采访王兰义笔记2005年12月13日）。10月9日，九一三事件26天，周恩来看到《“571”工程纪要》。

这些不同的说法，使《“571”工程纪要》的发现时间扑朔迷离。

林立果空军学院“据点”的查封时间

吴忠回忆：9月13日凌晨3时多，周总理简要指示了几项应急措施：一、派部队和民兵严密搜索外逃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二、派卫戍部队立即封闭北京郊区几个机场，没有中央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降落。三、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京的几处黑据点，并搜集其罪证。四、加强对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电报大楼要害部位的警卫，并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增派部队，协助中央警卫团确保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五、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由卫戍区统一部署和指挥北京地区的战备工作。9月13日晚上，“吴（德）、吴（忠）、杨（俊生）组织卫戍区数十名干部迅速查封了林彪一伙在京的五处秘密据点，吴忠亲自到每个据点指导他们细致检查，查获了许多重要罪证。”（李英、李维赛《吴忠有忠——动乱岁月的吴忠将军》，征求意见稿，1998年2月，第19页至21页）

时任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长的王树德回忆：“九一三”事件发生当天，“周总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机智果断地采取极为策略的措施，做了周密的布置。其中措施之一，就是命令北京卫戍区马上派了可靠干部，带领部队把林立果一伙在北京东郊民巷、西郊机场和空军学院的三个黑窝点看管起来，以防林彪余党继续利用这些窝点进行阴谋活动和销毁罪证。当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政委杨俊生紧急召集我们执行任务的干部开会，进行动员和交代任务。由于党中央那时还不知道林彪专机已经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事件涉及的范围也不明朗，所以

保持极高的警惕性，规定了严格的纪律，……首长令我带领四名机关干部和仪仗营一连连长刘俊章及一个加强班，全副武装，荷枪实弹，连夜秘密地进驻空军学院林立果的黑窝点。”（王树德《征程漫忆·看管林立果的黑窝点》第二集，北京军区政治部八里庄干休所 1996 年内部版，第 167-170 页）

时任北京卫戍区仪仗营一连连长的刘俊章回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还在笔记本上记上了日期，就是“九一三”事件当晚，我们连正在营房看电影，突然接到命令，紧急到西郊机场待命。我们到了西郊机场礼堂，刚放下背包，营长王殿海单独指示我：“立即秘密带一个加强班到空军学院执行任务。”我立即组织了 20 人，全副武装，带着轻机枪，天黑也不认识路，只按大致方向，翻墙进入空军学院林立果的“据点”。我们进去以后，发现里面乱七八糟，北楼有几大筐干海参。我记得下水道里还有纸灰，林立果房间里的哈密瓜切成了条，并没有坏。我们在里面蹲守 20 多天，不准任何无关人员进入。（舒云采访刘俊章笔记，2014 年 8 月 18 日）

笔者多次采访查封林立果空军学院据点的王树德、刘俊章，还采访过时任北京卫戍区通信处处长的谷禹舜，他是负责查封林立果东交民巷据点的。他们三人都记得非常清楚，他们是“九一三”事件当天执行查封林立果据点任务的。

有人说吴德、吴忠甚至周恩来当时不可能知道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如果周恩来等人不知道，怎么可能当晚派人查封呢？至于吴忠说周总理有五条指示，而吴德说周总理有四条指示。吴德确实只说了四条，没有查封林立果据点这一条，不过吴德说的是“周总理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 年第二版，第 100-101 页），这说明吴德并不确认只有四条。

时任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的张辉灿回忆：周总理的五条指示是事后卫戍区归纳的。当时事情很紧急，周总理想起一条说一条。比如搜索直升机是总理最先提出来的，进驻机场等是后来提的，其中四条都是由我们作战处负责，而查封据点是秘密行动，由保卫部王树德他们负责。（舒云采访张辉灿笔记，2014 年 8 月 12 日）

周恩来五条指示之一是查封林立果的“据点”，有三人证实“九一三”当晚查封了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据点”。王树德回忆：空军学院的“据点”是两座小楼，没有看见《“571 工程”纪要》。刘俊章也说没有看见一入门的客厅茶几上有本子和书，就是说查封空军学院林立果秘密据点的两个人，都没有看见《“571 工程”纪要》。

既然林立果“据点”查封后轻机枪封锁大门，不许任何人员进入，负责打扫卫生的王兰义又怎么可能在“九一三”事件三天后拿走《“571 工程”纪要》呢？

《“571工程”纪要》的发现者

说法一：吴忠。

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工程纪要”》的要点草稿。（《百战将星吴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至383页）

说法二：送饭人（或食堂工作人员）（见前述）。

说法三：打扫卫生的公务员（见前述）。

说法四：空军学院干部王兰义（见前述）。

综上所述，《“571工程”纪要》的发现地点、发现时间、发现者，皆成谜团。

谜团之二：“林彪手令”的不同版本

1971年9月13日，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在怀柔直升机现场发现被周宇驰撕碎的纸片。经公安部技术人员拼接，被公之于众。其中一张纸缺失三分之二，上用红笔竖写着：“盼照……宇驰同……的命……林，九月八日。”经看过“林彪手令”的人辨认，上面的字迹应该是：“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这就是竖版的“林彪手令”。

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等人看到的“林彪手令”都是“竖版”，只有两个人看到的“林彪手令”是横版。关光烈时任27军某师政治委员，以前担任过林彪秘书。所以林立果认识他。为了从他那里要火焰喷射器，把他叫到北京，给他看了“林彪手令”。关光烈记得内容与公开的竖版“林彪手令”一样，但他看到的却是“横版”（舒云采访关光烈笔记，2000年9月9日）。

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从林立果那里看到的“林彪手令”也是“横版”。胡萍说：“1971年9月8日晚上，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下飞机后给我看了‘林彪手令’，是横写的。”法庭上没有给胡萍出示‘林彪手令’。出狱后胡萍又双目失明，所以他一直以为“林彪手令”就是“横版”的。（舒云采访胡萍笔记，2000年12月）

据目前所知，“横版”的“林彪手令”目前知道出现过两次，都是林立果出示的。林立果9月8日晚从北戴河到北京西郊机场，在机场给胡萍出示的是“横版”手令，到毛家湾给于运深出示的是“竖版”手令。关光烈、胡萍看到的“横版”“林彪手令”都是由林立果出示的。而看到“林彪手令”“竖版”的大都是由

周宇驰出示的，包括最后周宇驰用“林彪手令”要直升机。看到“林彪手令”的直升机副大队长陈士印，沙河机场调度长老陈，他们看到的“林彪手令”都是“竖版”。最后这个“竖版”“林彪手令”被周宇驰自杀前撕碎，在直升机坠机现场被发现。而“横版”的“林彪手令”至今未曾露面。如果一直在林立果身上，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再见到了。

在北戴河发现的第三个“林彪手令”。

1971年9月15日，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嘱咐，经汪东兴安排，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赖奎处长、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王歆秘书，先后到北戴河和北京毛家湾，清查林彪住地的文件。他们先到林彪临走时住的96号楼，察看了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值班室等处。有些地方显得相当凌乱，门窗橱柜有的半开半关，书、报、杂志、信件等到处堆放，有些纸张、办公用品散落在地毯上，墙角边。他们开始逐屋清理，片纸只字都不放过。第二天清理出一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八。”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手令”。（武健华《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党史博览》2011年12期）

武健华告诉笔者，他看到“林彪手令”是“竖版”，与“中央公布”的一样。但笔者注意到，武健华在北戴河96楼查抄的“林彪手令”，与中央公布的“林彪手令”有四点差别：第一是完整的一张白纸，而不是中央公布的碎片；第二发现地点不同，中央公布的“林彪手令”是在北京怀柔直升机迫降现场，而武健华查抄的“林彪手令”是在北戴河96楼；第三“宇驰”后面没有中央公布的“同志”二字；第四中央公布的不是“九·八”，而是“九月八日”。后两点差别有可能是武健华记忆有误。

难道第三张“林彪手令”又出现了？

为什么1980年审判“两案”时没有公布北戴河的这张“林彪手令”？也没有查证“横版”的“林彪手令”？

从中央公布的竖版“林彪手令”看，笔迹生硬，是林彪写的吗？

为什么要像练字一样写三张？

为什么“竖版”“林彪手令”在周宇驰的身上？“横版”“林彪手令”在哪里？

这种种谜团，都是需要我们搞清楚的。

【争鸣】

林彪事件的关键是林彪是否参与“两谋”

陈平泉

《炎黄春秋》2015年第7期刊登了王海光《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几个问题》，他文中说：“一些官方结论不是不能质疑的，但是必须是摆事实讲道理，依据史实根据研究问题，搞清楚事实真相，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王海光这段话说得很好。研究林彪事件，跟研究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样，当然不能搞道听途说，不能搞传奇演义，一定要客观公正，摆事实讲道理。

可是，读完王海光全文，除了讲些大道理外，发现这篇专门谈林彪事件研究的文章，却回避了林彪事件的关键所在，即林彪是否参与了“两谋”——阴谋杀害毛泽东，阴谋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具体到“九一三”事件的出走来说，就是林彪是否知道去苏联。

如果林彪参与了“两谋”，知道要去苏联，当然可能故布疑阵，口头上说去大连，但实际上去苏联。可是，林彪不可能隐藏他为去苏联所做的准备。

林彪不是普通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有内勤、秘书等工作人員“监视”。1969年国庆节后林彪去张家口作战备视察，上上下下，岂只几十几百人知道，完全可以用“兴师动众”来形容。林彪要去苏联，更不是普通的出行，当然是比去张家口视察更大的动作，再隐蔽，也会露出蛛丝马迹。为什么中央专案组审查近四年，始终没有查出，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也始终没有揭发出林彪准备去苏联的一点证据？

至于李文普说林彪问了“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的孤证，是很容易拆穿的。林彪两次乘飞机飞往苏联治病，都在伊尔库茨克落地加过油，他能不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即便林彪没有去过伊尔库茨克，他身经百战，作战地图甚至能背下来，也不可能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样可笑的问题。伊尔库茨克是苏联的重要城市，又是北京到莫斯科的中转站，1969年秋天的战备，伊尔库茨克是林彪最关注的城市。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王海光在文中猜测：“林立果、叶群他们搞有些小动作，林彪未必都知道，但大的方面，还是林彪说了算。”“大的方面”，是哪些方面？什么叫“大的方面，还是林彪说了算”？“两谋”当然是最大的“大的方面”了，那么是“林彪说了算”吗？证据何在？

王海光指责民间对林彪事件的研究是做翻案文章，还说：“所谓‘翻案’问题是搞政治定性，做政治结论，不是做学术研究。”王海光应该知道，学术研究上做“翻案”文章的事例太多了，按王海光的这个说法岂不都成了“搞政治定性，做政治结论，不是做学术研究”？

再说，即使是做政治结论，翻案就一定是坏事吗？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陶铸等等等等的冤案都翻了，都重新做了政治定性、政治结论，难道有错吗？

毛泽东也说过“有错必纠”，那不就是有错案必翻吗？王海光将民间研究者提出的质疑和不同意见指责为“一味与官方较劲”，“借林彪事件搞政治”，甚至扣上“捧林反毛骂‘老共’”的大帽子，这恰恰违背了王海光自己所说的“研究林彪事件要客观公正”。

王海光说：“如今，林彪事件已经从政治领域走入了历史研究领域。”但是细读王海光此文，却看到他并没有把林彪事件当成历史研究，特别突出的是，他竟然给黄吴李邱贴上了“负面人物”的标签。难道这就是王海光所说的“学者据实而论的独立研究，保持超越政治的客观立场”？岂不是又在“搞政治定性，做政治结论”？

王海光批评一些研究者用纪实文学手法搞林彪研究，他认为纪实文学的写作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王海光自己的文章倒有“小事不拘”的例子，在署名王海光的《毛家湾清查林彪“罪证”材料纪事》（载《领导者》第54期，2013年10月25日）中，有这样两段话：“叶群的两腿不一样长，一只腿长一只腿短。所以她的鞋子也是一只高一只低，有一只鞋子是垫上的。”“叶群的品位很低。当时，张显扬、王贵秀他们看过叶群和黄、吴、李、邱到机场接人的一段录像。叶群高兴起来的样子，像个小孩子一样，跳跳蹦蹦。”不知这是不是王海光所指责的“道听途说”“以文乱史”？

王海光此文处处以专家、权威自居，指责别人“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没有“采访者的学术资格”，好像他不知道曾经被“批倒批臭”后来又“翻案”恢复名誉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有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炎黄春秋》本身就是一本民间杂志，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发行量一再攀升。而王海光为什么在这个“很不专业”的民间杂志上发表文章呢？

王海光文中插图的四本书封面照，说明文字（不知是王海光还是杂志编辑加的）说这是“近几年来海外出版的有关林彪研究的书”，也有点莫名其妙。据查，《林彪沉浮录》1988年版，《风云“九一三”》1999年版，《重审林彪罪案》2004年版，《林彪事件完整调查》2006年版。说这些书都是“近几年出版”的，显然不准确，而说它们都是“海外出版”，则更是大错。出版《林彪浮沉录》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是外交部主管、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权威性国际问题书刊出版社，在知识界和青年人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出版《风云“九一三”》的解放军出版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第一出版社，它们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社，怎么能说成“海外出版”呢？就是香港出的两本书，也不能算“海外”，而只是“境外”。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争鸣】

林彪知道去苏联吗？ ——与张光渝先生商榷

舒 云

“九一三”事件至今44年，仍众说纷纭。张光渝先生在《“九一三”林彪飞行目的地的逻辑推理》（原载《读书鉴史：解读周恩来》一书，《昨天》第42期转载）一文作出这样的推论：“林彪不可能为了前往大连而甩开警卫部队和机组人员急匆匆爬上飞机强行起飞，这样反常的离去手段与目的地大连在逻辑上完全无法吻合。”进而推出两个结论：结论一，李德、舒云编著的《林彪日记》说“林彪说去大连，但知不知道去苏联还是一个谜”是不客观的；结论二，“九一三”事件是林豆豆制造的，“没有她的报告，就没有今版‘九一三’事件。”

张先生的“逻辑推理”其实是不合逻辑的。

林彪连夜走是否就“不正常”

1971年9月12日23时过后，林彪打铃叫内勤张恒昌，说：“今晚不休息了，准备马上夜航到大连去，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有些东西可以不带了。”林彪另一位内勤陈占照回忆，晚上11时50分左右，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起来到林彪的客厅。过了一会，叶群、林立果出来。林彪又打铃，我到林彪客厅，林彪对我说：“马上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过几天再回来，回北京过国庆。”（邵一海《林彪913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46、248页）

张先生认为，林彪没有理由连夜去大连。这是因为张先生不了解林彪，林彪连夜出走、说走就走，并不奇怪。负责专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就曾抱怨过：“林家用专机像用专车一样。”林彪、叶群都是急性子，什么时候想起了，说走就要走。

文化大革命中叶群为躲江青，就曾连夜出走过。1968年8月，江青要林彪批转她如何抓样板戏的大文章，林彪一直压着。江青要来见林彪，叶群怕林彪与江青当面顶起来，就安排林彪去北戴河了。……就在叶群听到江青要来北戴河的前一天晚上，林彪、叶群连夜离开北戴河，临时住在山海关机场（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镜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54-56页）。

1971年9月6日晚，叶群打电话给胡萍，说林豆豆等要来北戴河，让胡萍连夜派飞机。胡萍建议第二天上午走，否则也就连夜走了。

李文普回忆：“（1971年9月12日）大约23时多，叶群叫我到林彪卧室，她先进去跟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李文普这段回忆回答了张先生关于林彪为什么要连夜匆忙去大连的问题：是因为“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这对于不了解林彪的旁观者来说肯定是“不正常”，“非常规”，而只要对林彪的性格、作风及他当时的地位、特权多少有些了解，就不会感到奇怪。

张先生认为：“叶群、林立果欺骗林彪？有这个可能吗？林彪以为去大连，上了飞机却糊里糊涂飞往苏联？”为了证明没有这个可能，张先生举出“林彪若去大连，干嘛不带警卫部队？不带自己的女儿女婿？这一切都是在林彪驻地而不是飞机上发生的事情，林彪干嘛要用这样的手段离开北戴河转往大连？这符合逻辑吗？”

这当然符合逻辑——符合林彪的逻辑。如果林彪每次外出都带自己的女儿，那么“九一三”事件不带自己女儿就是反常，就不符合逻辑。事实并不是这样。林彪外出并不是每次都带自己的女儿，所以“九一三”事件林彪不带自己女儿走并不反常。

至于张先生所说林彪“甩开警卫部队和机组人员”，这也是不了解林彪生活起居情况的外行话。这些具体事务与林彪无关。林彪不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他身居高位，本来就只考虑大事，更何况林彪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平时与人只谈工作，决不闲聊，更不会迎来送往。他要出行，有谁跟着走，跟着走多少人，自然有人安排。甚至林彪自己的衣食住行，也用不着林彪本人操心，全部由叶群安排。

张先生认为不可能“欺骗林彪”，这又是不了解林彪情况的外行话。毛家湾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叶群欺骗林彪的事情太多了。连他心爱的女儿豆豆曾被叶群逼得以自杀抗争的事，都没有谁敢给林彪讲，林彪至死都不知道。

叶群还曾在飞行航线上欺骗过林彪。1969年8月下旬，林彪重上井冈山。返回的时候，叶群怕林彪受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的影响，限20分钟做准备，突然离开井冈山。没想到程世清还是闻讯来了，邀请林彪到南昌看一看。42年前林彪作为一名基层军官，参加了南昌起义，他对南昌的感情非同一般。林彪立即叫李文普通知去南昌。而叶群不想让林彪到南昌，她在空中下令改变航向。快到北戴河了，叶群才对林彪说实话，林彪火了：“我已经通知去南昌，你为什么改飞北戴河？航线不能改了，还是去南昌！”叶群说：“我早安排去北戴河了，不好改了，来不及改了，这个机组什么气候都能飞。”……林彪说：“我是南昌起义出来的，难道我连南昌也不能去了？！”在林彪、叶群的争吵声中，飞机

继续往北飞去……（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镜出版社 2012 年 9 月版，第 58-60 页）

叶群不仅自己骗林彪，还要求工作人员也一齐骗林彪，即便林彪拆穿了骗局，也没有用。

如果林彪临走对内勤说去大连是假，去苏联才是真，那么他事先一定会为去苏联做大量的准备。为什么具体掌管军队的黄吴李邱毫不知情？为什么林办没有任何一个人揭发出林彪有企图逃往苏联的言行？流传甚广的李文普说的林彪说“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也纯属子虚乌有。1980 年 8 月“两案”审理期间，总政林彪案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编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1970 年 3 月至 1971 年 9 月）》，记载了李文普若干条揭发材料，却没有记载“林彪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一“证据”。

林彪案审了十年，从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到文革后的“两案”办公室，都没有查到林彪知道去苏联的任何证据。从林彪的行为逻辑看来，林彪最后的晚上并无反常，他就是要去大连。

林彪遇到什么危险了？

张光渝先生认定林彪说去大连的话是假话时的一个“逻辑推理”是：“即使林彪发觉了危险，但采用非常手段连夜飞往大连，对避免危险来说是毫无作用的。”张先生假设了林彪“发觉有危险”的大前提，进而推论林彪要避险，只能逃到国外。

形式逻辑间接推理的基本形式之一“三段论”，是由大前提、小前提推出结论。张先生推论的大前提就错了，林彪遇到什么危险了？有什么证据证明林彪遇到了非得逃到国外去躲避的危险？

退一步说，即使林彪发现了张先生所说的这种危险，他会想到出国躲避吗？1971 年 9 月 11 日 12 时 30 分，内勤听到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就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2 页）林彪还明确表示他是民族主义者，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称是林彪内勤讲的。林彪内勤陈占照对我说：他是听叶群说的，林彪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这说明林彪不会想到去国外躲避危险。庐山会议后林彪一直不写检讨，就说明林彪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他安慰叶群的一个题字也是“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见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这就是他对可能面临的“危险”的态度。因此他完全没有理由跑到国外去。

主观猜测与客观事实

林彪临走说去大连，而林彪飞机却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这该怎么解释？

如果飞机上只有林彪一个人，那也会有多种可能性，比如迷航，比如飞机故障，不一定到达他预想的目的地大连。更何况飞机上有九个人，还可能有飞行员、机组人员或机上乘客劫机或者空中改变航向的可能。

我们现在知道，至少在 1969 年林彪就有两次在空中改变航向。一次是林彪从井冈山返回时本来要到南昌，而叶群却背着他命令空中改变航向，直飞北戴河；另一次是国庆节后林彪去张家口视察，林彪要看平型关，空中改变航向飞向山西。

“九一三”林彪专机是夜航，夜航中，乘客是不可能知道东南西北的。我坐过一次夜航，从哈尔滨直飞北京。两个多小时飞行中，我坐在靠窗的座位，努力睁大双眼，但机窗外犹如黑布，根本不知道飞机飞向哪里。直到飞机在北京降落，我才放下一颗心。

张光渝先生指责“（《林彪日记》）编著者以林彪曾说去大连为理由，将林彪飞往苏联的行动暗示成某种违背他的意志的强制行动”，而张先生站在“林彪知道去苏联”的立场上，却没有拿出一个证据来证明他的“逻辑推理”，只盼望“以后发现的新史实补充修订”。在“林彪知道”的“新史实”出现前，张先生的“逻辑推理”也只能是主观猜测，而不是客观事实。

“九一三”事件推不到林豆豆头上

张光渝先生认为：“‘九一三’事件并非‘预谋’，既不是林彪的预谋，也不是周恩来或毛泽东的预谋。如果说‘九一三’是针对林彪的‘预谋陷害事件’，那就要从林豆豆查起。没有她的报告，就没有今版‘九一三’事件。”〔左图：舒云（左）和林豆豆在《解放军画报》高级记者孟昭瑞家里。孟昭瑞摄。〕



“九一三”事件后，强加在林豆豆头上的罪名很多，指责她“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说法，1974 年林豆豆曾以自杀表示抗议。1987 年林豆豆从郑州回到北京，有关方面对她约法三章：

一不许见记者，二不许对外发表言论，三不许会见外宾。这一切都是试图封她的口。张先生说：“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在阻拦一方，而在于出走一方，林彪、叶群、林立果如果不愿意走，谁又能让他们走呢？”张先生指责林豆豆“将罪责归于警卫部队及其上级，再在其他人的鼓动配合之下推演为某种有意致林彪于死地的蓄意的‘阴谋’。”这些话与这些年对林豆豆的攻击异曲同工。

张先生说得对：“林彪、叶群、林立果如果不愿意走，谁又能让他们走呢？”林豆豆报告的本意是要 8341 部队保护林彪，不让叶群、林立果带走林彪。荷枪实弹的 8341 警卫部队，拦阻林彪这位手无寸铁的老人有何困难？可是从林豆豆第一次报告到第五次报告，8341 部队有两个多小时的充足时间，却没有接到拦阻命令，倒是接到了让林豆豆他们也上飞机的指令，最后眼睁睁看着林彪飞机强行起飞。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问一句：“如果毛泽东不让林彪走，林彪又怎么能够走成呢？”

林豆豆没有错，也不存在像张先生所说把罪责推到“警卫部队及其上级”身上的问题。嫌疑人因为办案人不作为跑了，难道要举报人负责？请张先生再重温毛泽东关于林彪专机越境前的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走吧。”

谁应该为“九一三”事件承担责任？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编读往来】

陈闯创谈 55 期

这期文章很好看，一气读完。第 26 页有一处笔误，“5 月 7 日早晨，两位院长一起离开河卡回西宁”，显然应该是“6 月 7 日”，因为第 18 页中有“6 月 7 日，两位院长一起离开河卡回西宁去了”。

孙定华文屡屡提到中央和青海的报纸、电台所发表的重要文章对文革进程的影响，并举出具体例子和当时背景，这个回忆很有价值，这有助于理解毛和中央文革通过媒体直接指导文革的激进做法和中共官僚通过组织系统层层布置的保守惯性之间的矛盾。

孙文提到“6 月 5 日，两位院长给我们传达了中共中央 3 月份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指出现在教育界、学术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权，这些人在思想上是一批国民党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出修正主义。”这个回忆让我很感兴趣：当时是依据什么中央文件传达的？传达内容是否包括毛在 3 月 20 日所讲“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

杨国斌先生对澳洲收藏文革日记的介绍太有价值了，希望能早日目睹这些日记。

亦文谈揪彭德怀回京的背后原因

《昨天》54期北京地院专辑中提到地院东方红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事件，从学生的角度讲了当时情况。据笔者所看到另外的口述资料记载，其背后原因是李井泉给毛写了一封信“告密”，说彭在四川到处乱跑，这才有毛示意江青把彭弄回北京的决定。戚本禹与朱成昭、王大宾都不过是具体的执行者而已。后来的许多文章把戚等人定为“迫害彭总”的罪魁祸首，是有偏差的。

另据李井泉文革检讨书的内容判断：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当面责问李，中央有同志怀疑你与彭真、贺龙的关系问题。彭真在罗瑞卿陪同下1964年到过四川，李热情接待，全程陪同；贺龙在1965年至1966年初也多次视察四川、云南的三线建设，李也几乎全程陪同。此时，李为求自保，一方面写检查材料澄清自己与彭真、贺龙的关系，另一方面就把彭德怀抛出以表忠心。当然，那个时候姚文元的文章已经发表近一年，彭德怀已经成了“死老虎”，李的行为算不算“落井下石”，另当别论。

其实毛把彭放逐到西南，就是要李暗中看管的，李心中应该明白。毛时代党内上层政治，原本就是如此。